



1994—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信使

1994年第5期(总第166期)



27 JUN 1994

多彩的 语言世界

- ✓语言与文化
- ✓语言生死论
- ✓旧话重提巴别塔

人物专访
古生物学家
伊夫·科彭

ISSN 0250-8869



9 770250 886006



05>

恳请读者投寄照片供本专栏选登,所寄照片可以展示一幅绘画、一件雕塑品、一座建筑物或其他任何作品。只要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的交融即可。同样也可以投寄代表不同文化背景,又有惊人联系和相似之处的两件作品的照片。所有照片均请附简短说明。

埃舒

1980,木料和马牙(高 80cm)
奇科·塔比布亚作

“你从书本上学,我则从梦中学,”早先的伐木工,尔今已成为当代巴西民间艺术大师之一的奇科·塔比布亚作如是说。这里展示的雕塑,跟他的其他作品一样,都首先出现于他的梦中。它描摹的是埃舒的形象,这是“温班达”——非洲裔巴西人的一种宗教礼仪——中一位主生殖和创造力的神。发现塔比布亚并对其工作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巴西博物馆学家保罗·帕尔达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他的雕塑中发现“在无意识中存在的古老而普遍的神话”。





多彩的 语言世界

10 语言天赋

斯蒂芬·乌尔姆

16 旧话重提巴别塔

彼得·米尔霍伊泽

22 尼日利亚的选择

阿约·巴姆博斯

32 西伯利亚语言的消亡

弗拉基米尔·贝利科夫

37 小鸡与香蕉

39 赠礼和失礼

贾田(音译)

封面:

语言之弧(1993),计算机成像。

埃泽谢尔·萨阿德

为本期《信使》特制。

语言被设想成层层叠叠的彩色波浪,

把思想传遍世界。

42 教科文组织在行动
简 讯

27
绿色观察哨

43
费德里科·
马约尔
的评论

伊夫·科彭

与弗朗西斯·利里一席谈

马肇元 译

国际著名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彭是(巴黎)法兰西学院古人类学与史前史学教授。他曾开展过广泛的实地调研工作,由之而发现了许多人科动物化石以及已知年代最久远的石器(三百万年以上)。他并构建起了用以阐释人科动物起源(八百万年以前)和人类起源(三百万年以前)的模式,以及阐释思维进化的文化模式。他最近的出版物计有:《序曲,人类迈出的最初几步》(1988)、《露西的梦》(1990,与皮埃尔·佩洛和塔尼诺·利贝拉托尔合著),以及《人类的起源与进化》,该文刊发在《第欧根尼》第155期《从星象到思维》上,这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份季刊(由教科文组织资助,美国普罗维登斯伯格出版社和英国牛津出版社出版)。

们这一领域的这些根本性问题极富象征意义,所以我将它用在《古人类学手册》学术丛书某卷的封面上,我编这套丛书已有15年之久了。

■ 恐龙是一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东西。这些巨兽在二亿二千万年前的地球上到处游荡,挺过了侏罗纪和白垩纪,直到七千万年前才消失不见。对于恐龙的灭绝,已经提出了种种解释。你的看法如何?

物种大规模灭绝的问题,与地球历史上发生的不同事件有关,诸如海洋的扩大与缩小之类。在最近这五亿年间,已知有35种物种已经灭绝。这就是说,恐龙的灭绝,包括同一时期某些软体动物的灭绝,都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有关“死亡之星”坠入地球的流星理论,对我来说,不啻像恐龙般硕大无朋的天方夜谭。由于宇宙方面的原因,地球所处的视差位置以及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意味着生命史是由物种的连续不断的扩大时期与逐渐缩小甚或相当迅速的灭绝时期相交替而组成的。

■ 高庚曾画过一幅著名的三联画,描述塔希提女人与一群动物及一位当地仙女在一起的如梦如幻的裸体形象。他把这一才华横溢的色彩与意象的幻想曲冠以《我们从何处来?我们为何人?我们向何处去?》的名称,从而使它成为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类处境的象征。我们是否可以说,高庚的这些问题概括了人类学研究的目所在?

绝对可以。它们或许还是人类自觉意向萌发之所想到的头三个问题,最近有些哲学家把它们称之为“存在的痛苦”。高庚的这幅三联画对我

■ 该不会是这些巨兽的体积本身影响了有关它们灭绝的理论的形成?像霸王龙之类凶猛的食肉动物,体长15米,是不可能如此平静地消声匿迹的。必定是出了什么重大的突变,才逼使它们消失的,对不?

弗朗西斯·利里(Francis Leary),
美国作家、记者。



我想,你说的有道理。二亿年前一种名叫三叶虫的无脊椎动物的灭绝,抑或与恐龙同时代的美丽的软体动物菊石的消失,都没有引发如此浪漫的理论。

■ 我们今天所见的鸟类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吗?

肯定是的。已知最早的鸟类,上侏罗纪时期的始祖鸟,就很像恐龙,在解剖学上类似于约翰·奥斯特罗姆1964年在耶鲁发现的那种小型恐龙,Deinonychus; 诸如有关牙齿,长长的利爪,等等。不过,始祖鸟还是温血动物,像鸟一样有羽毛隔热保温。

■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起源的时标上,类人猿是人类最远古的始祖,出现于大约二千万年前。过了几百万年,灵长类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了猿,如黑猩猩和大猩猩,一部分则成了人科动物。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分裂,须知若不是这一分裂,恐怕永远不可能有我们,至少不可能有今天这种样子的我们?

1963至1978年间在东非发掘15年之后,我在数以千万计的脊椎动物化石(它们散布于断代为八百万年至一百万年之间的各地层)中,出人意外地并没有收集到任何黑猩猩或前黑猩猩以及大猩猩或前大猩猩的化石遗

存。相反,我在这些遗址中却发现了几百具人科动物的化石遗存。鉴于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在其时宣称说,就有关的遗传基因和蛋白质论,非洲猿类显然是人类最近的近亲,就是说,黑猩猩和大猩猩是堂表兄弟,我们与之有共同的祖先,因此,我认为努力解开这一旷世之谜是很有意义的事儿。非洲猿类与我们是亲戚,但在现场发掘中却从未见过他们在一起的痕迹。

1982年,我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随后在其他场合以及许多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一明显的矛盾的模式,我把它称之为“东边的故事”。恰好是在八百万年前,猿与人科动物分裂

人类完全有可能有一个祖先是南方古猿， 但到底是哪一种？ 了解得确实还不很清楚。

之前，我们共同的祖先全都生活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之间，横跨赤道非洲，十分低洼潮湿的茂密的森林地带。

这期间发生了地壳结构的变动。裂谷下沉 4,000 米，而其周边却耸起 4,000 米，从而形成了分隔东西的一道屏障，造成了重大的生态后果。与东方隔断之后，裂谷到大西洋之间的西部地区依然潮湿，树木葱茏，但在裂谷与印度洋之间的东部地区却变成了一片旷野，干燥得多，只是由于新形成的季风系而季节性地降水。

我们共同的祖先猿类，分裂为西部一大群落和东部一小群落。处在森林环境中的西部猿类有可能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祖先，而东部猿类则不得不去适应新形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十分有可能是人科动物，南方古猿及随后的人属的前身。

■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般下了树的。

他们下树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下树！随着树林的消失，他们别无选择。

■ 1974 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谷地发现了一具女人的骨骼化石。这具

骨骼可以追溯到大约三百万年前，比之以前发现的任何骨骼都更完整。仿照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曲《天堂里戴钻石的露西》，她被命名为“露西”。你能谈谈这次阿法尔科学考察活动及其对古生物学的意义吗？

阿法尔古生物遗址是法国地质学家莫里斯·泰布在 1960 年代发现的。由于我与他很熟悉，我是应邀提供咨询意见的第一人，根据对收集到的化石遗存的测定，我断定这些遗址的大致地质年代为二百到三百万年。

1972 年，泰布组织了一次实行国际领导的科学考察：由两名法国科学家泰布和我，两名美国人唐·约翰逊和乔恩·卡尔布，组成了国际阿法文研究考察队。在六年时间里，我们指挥了五场战役。首屈一指的发现便是露西，大约三百万年前的一头南方古猿。这是首次发现属于这一时期而又如此完整的骨骼，我们也才破天荒地对这个标本的大小、比例以及关节如何活动有了一个像样的概念。

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我准备了十个论题对之进行研究分析，每个论题都花三年时间，换言之，总共准备花费 30 年时间去了解露西的活动状态！

我们最终描绘出了一幅前人类女性的惊人画面：她大约 20 岁，身高 1 米至 1.2 米；体重 20 至 25 公斤，长长的手臂，短短的腿。她吃果实、根茎，可能使用原始的石器。她直立，像两足动物一样行走，但是用小碎步，摇摆着双肩和臀部。借助于扁平的脚掌和能握物的大脚趾、能弯曲自如的手指骨和脚趾骨，她依然爬树。

■ 在我们的谱系图中，你想把露西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露西可能是远亲，但无论如何她隶属于南方古猿类，我们给这种古猿起了个学名叫阿法尔古猿，他们也变成了三百万年前在东非出现的那种人属。这一出现与另一种环境事件有关，这是我 1970 年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莫河谷的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便是我之所以一语双关，把它称之为奥莫（Homo——人，与 Omo 河同音）事件的原因。

在距今三百三十万年和二百四十万年之间，出现了一场重大的气候危机——长期干旱不雨。我们从三百万年到二百万年间的地质层化石成分中了解到，树木数量锐减。整个动物界都改变了习性，以求适应改变了的环境。就人科动物而论，人属的脑容量之所以比较大，便是解答。可怜的露西，脑容量才 340 CC，而人属的脑容量为 800 CC。比之南方古猿，人属的牙齿也更适合去咀嚼品种更为多样的食物。

■ 1972 年，肯尼亚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岸上发现了几具距今大约二百万年的人科动物化石。这些人科动物直立行走，“像现代人一样，轻松地大步行走”。能人可能是人类的祖先，他们的脑容量

为800 CC,为今人脑容量的一半以上。

鉴于最早的人类是在东非发现的,而在东非也发现了最早的**南方古猿**;鉴于南方古猿在外表上与人类最相近;又鉴于最早的南方古猿比之最早的人类年代更久远,因而人类完全有可能有一个祖先是南方古猿。

但到底是哪一种,了解得确实还不很清楚。

南方古猿为素食,只在万不得已时才破例肉食。由于三百万年前的那场气候危机,**人属(能人)**既素食又肉食;因此,他们很可能是首批杀生者,不仅食尸,而且还狩猎。



■ 关于人是否从他几百万年前的远祖那里继承了杀生本能的争论,首先是由雷蒙·达特挑起的。这位南非解剖学教授推断说,1924年在喀拉哈利大沙漠附近的汤恩发现的一具头盖骨,是生活在三百万年前的一个六岁南方古猿的头盖骨。那造物直立行走,脑容量相当于大猩猩的。牙齿提供了证据,使达特认为那是肉食动物。他说的对吗?

达特把某些使他联想到南方古猿的动物骨骼解释为工具。被某些作家称作“达特事实”的这种解释,或许有部分是正确的。不过,根据对留在其牙齿表面的斑痕及牙齿形态的分析,现在看起来,南方古猿似乎更像是素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

一天,在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里佛,我必须就“汤恩小儿”问题作一讲演。讲演组织者起意画一幅大海报,上画这一南方古猿小儿的复原形象。讲演马上就要开始,我看见两位马尔加什女子在看海报,其中之一对另一位说:“这位讲演人看起来还真年轻!”

■ 其化石于1856年在杜塞尔多夫附近被发现的尼安德塔人,据说是由**粗壮南方古猿**,一种智力迟钝、颌骨粗壮、取食植物的人科动物演化而来的,由于一百万年前的那一步跨度过大,这种人科动物消失了,但也有人认为,它还存活在尼安德塔人身上,尼安德塔人与之或多或少有些相似之处。尼安德塔人让位给了克罗马农人。尼安德塔人又遭到什么意外了呢?

粗壮南方古猿是人科动物对奥莫气候危机的适应性结果之一,就是说,是一种新的南方古猿,更粗壮、高大,也更有力气,齿列非常特殊,门齿细小,臼齿硕大,完全是用来对付那些难

以咀嚼的草木植物的。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粗壮古猿似乎在一百万年前就已灭绝了。

还有，看来似乎是人属，但由于其较大的脑容量使之变得更加胆大，又由于杂食而更趋于流动，因而首开纪录扩展了他们的疆域。很快，这些冒险者便由东非而达中东，然后再向欧洲和亚洲进发，逐渐地变成了我们通常所谓的直立人和智人，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种类。

但是，由于第四纪时期持续的冰川作用席卷了阿尔卑斯山、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和波兰，这首批人科动物与外界隔绝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些种群便在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变化。在西欧，跟其他地方一样，能人变成了直立人，但那是一种独特的直立人，已经带有尼安德塔人的某些特征，接着，这一直立人，也跟别的地方一样变成了智人，但那是一种有特色的智人，我们称之为智人尼安德塔亚种。

因此，尼安德塔人不是粗壮南方古猿的后代，而是由人属在被称之为西欧的一片孤岛上演变成的。这种遗传基因的变化直到三四万年前，当智慧智人从中东来到西欧时才告结束。否则，尼安德塔现象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人类，再也无法与其他人种，即与克罗马农人通婚的人类。

■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过去常被用来为白人优于其他人种，譬如说，优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那种论点辩护。你对此有何见解？

任何学科的任何科学家，诚如任何俗人一样，或多或少都会有先入之见。只要这类先入之见仅仅是一种工作假设，那就都是合理的。假设若得到证实，很好，若得不到证实，真正的科

学家就当忘掉它们，改弦易辙。这是辨别一个好科学家的方法。

达尔文是位杰出的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异常明确的综合概念，但当他试图不作任何修正就把他从动植物身上得出的结论应用到人类和人类社会时，就大错特错了。他忘记了文化

发挥了作用，带来了自由和责任，从而使规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 你曾任巴黎人类博物馆馆长之职，在该博物馆前厅有一大块牌示，要人们把“文化”留在衣帽间，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普遍的生物关系上。



但是,诚如我们每天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却往往由于物质和文化上的差异而暴力相向,从而造成怒与恨的大爆发。

人与人各各不同,人们又常常因为经济的、领土的和宗教的纷争而四分五裂,引发暴力,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些差异就本质而论都只是表面的,这同样也是事实。我们全都是**智慧智人**,有着相同的、使我们区别于猿类的遗传基因特征。

■ 某些人借口没有哪位科学家能对人类智力的发展情况,连同其全部的复杂性与成就作一完满的解释,而抓住人类学的发现作为神意裁判的证据。人们该如何来说明人类在动物王国中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呢?

第一批石器的发明是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文化由此而被引进了自然。我本人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进行的那次考察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那批石器,已有三百三十万年之久。在自然环境独霸于世四十亿年之后,突然,在三百万年前,人科动物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环境,这改变了一切,因为人将比大自然更迅速地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作出反应,在生物界适应之前就已适应了这些挑战。因此,生物的进化将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进化。

寻求超越进化论范畴的解释,证明进化产生于意识的觉醒及努力减轻“生存恐惧”的愿望,均已越出自然科学的领域。我们的科学研究的终点是通过历史描述世界,找到解释去说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而这一自然的解释是无法解决这一超自然的问题的。

生命自身的起源(已知在古生物时期只是短暂的片刻);多细胞生命及

性的出现;呼吸空气、视力、思维、语言的发展;文化的发明——生命史上的每一步都是一个惊人之举。得力于史前史研究,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工具制造者与克罗门农人之间的各中间阶段,以及,举例而言,克罗门农人与苏美尔和阿卡得文明之间的各个中间阶段。

人在这个阶段是“选择”发展其神经系统以适应环境的唯一一种动物。其他动物则选择了改变其四肢以跑得更快,或改变其牙齿以改良饮食。科学的回答可以是:面对诸如此类的环境事件,如上所述,人通过发展大脑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但马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哲学的回答可以是:这一事件发生在这一地区而不是别的地区,发生在那一时间而不是别的时间,而人是动物王国中那种发展其脑子的成员。

■ 人类的天性能否改变,使我

人在这个阶段是“选择” 发展其神经系统 以适应环境的唯一一种动物。

们的种族不会由于全面战争,由于我们脆弱的环境遭到破坏,或者由于急剧增加的人口问题而遭到灭绝?

我必须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自从大约三百万年前意识产生以来,人类在失去原始本能、获得自由的同时,发展了对自身及其环境的认识。虽然令人望而生畏的个人或集体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但我们正在通过感人至深的途径去组织答案以解决这些问题。

就整体而言,人类正在成为一个有识见、有理智、有组织并知道其责任所在的社会。但这并非易事,在三百万年间我们曾不得不学会去与成千上万,后来则是成百万的人打交道。而今我们则必须对付几十亿人口。教育;获得更多的知识,向我们的太阳系以及在遥远的将来向其他星系的殖民,将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世界,更好地驾驭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地球,并带来更多的自由。 ■



语言天赋

斯蒂芬·乌尔姆

萨克达 译

为了跨越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而进行交流,世界各地的人采取的对策五花八门,各有千秋

斯蒂芬·乌尔姆

(Stephen Wurm),

现任堪培拉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

语言学教授,已发表著作

300种,其中包括:《大洋

洲的巴布亚诸语言》

(1982),《太平洋地区语言

分布地图集》(1981—1993)

和《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1990)。

目

前世界上使用着5,000多种语言,

另外还有远远超过此数的方言。这

些语言和方言多数不能相通,只在

人数不多的群体内通用。

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全世界许多地方人员流动的规模急剧扩大,跨越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进行交流已经成为更加迫切而普遍存在的需要,为了满足此种需要而采取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

一个常见的办法是操两种彼此不同而互相邻近的语言的人,各自学会或者粗通对方



上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一位舞蹈家在“库拉”交易会的庆典仪式上。

对页图,秘鲁库斯科省一个叫茨卡特卡的村社首领手持装有银头的权杖。

的语言。这就叫作积极的双向双语现象。如果操不同语言的两个群体之中只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语言,这就叫作积极的单向双语现象。举个例子,比如两个邻近的群体都居住在海岸附近,但是只有一个紧靠海边,因而享有鱼盐之利,而这些商品正是另一个群体所渴求的。出售这些产品的一方处于经济上比求购一方更加有利的地位,二者打交道的时候,前者的语言势必比那个内陆部落的语言更具优势。

使节和谈判代表

双语现象有过一个十分有趣的实例。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某些一贯敌对的部落,他们操着各不相同的语言,但是又需要互通信息以解决争端。这些部落有个惯例,就是互相交换儿童到对方去寄养,这些儿童在掌握本部落语言之外又学会了收养他们的部落所操的语言。以后他们就充当使节兼译员,协助谈判解

决部落纠纷造成的定居点问题和其他问题。双方都有严格的法律,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有些人数很少的语言群体,他们处在人数较多的语言群体的包围之中,通常得学会好几种相邻群体的语言。这样的人可以充任译员,谈判家,中间人,从而发挥重要的文化作用。

跨语言交际问题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操两种或几种亲缘关系密切的语言的人可以学会听懂其他几种语言,但是不会说。在这种场合下,在场的人都说各自的语言,同时又能听

懂交际对方说的话,彼此都是一样。这种现象叫作消极的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在中亚细亚操各种突厥语或蒙古语的人当中,这种现象特别普遍,不过在非洲和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也有所发现。

通用语

上面提到的几种情形,其中所涉及的语言至少对于参与交际的一个群体来说是本族语。然而,在不少情况下,用来当作跨语言交际手



左图,在巴黎郊区一所学校的运动会上。

对页图,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居民在下田路上。



段的语言并不是任何一方的本族语。在操欧洲语言的人同操欧洲以外大语种的人进行交际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例如,法国人、挪威人、匈牙利人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所使用的是英语。这种用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际的中介语言叫作通用语。

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语言,而它们之所以取得了通用语的地位,其原因也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操这种语言的人拥有某些令人羡慕的文化特点,要么在文化上或政治上达到了优势地位,从而使得他们的语言在操其他语言的人看来有了优越性。许多通用语的出现是贸易往来的结果。操某一语言的商人漂洋过海外出经商,他们出售自己的货物时只说本族语,买主为了同他们做成生意,只得学习他们的语言,哪怕只是得其皮毛而已。非洲东部的斯瓦希里语,东印度群岛的集市马来语(目前正逐渐让位于印度尼西亚语),以及新几内亚一带的几种贸易语言,都是这类贸易通用语的实例。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和后来的现代波斯语这些伊朗境内的语言,都曾在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上充当

贸易通用语,前后达数百年之久。

洋泾浜语言

贸易通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多半简易化了,但是在作为本族语使用各该语言的群体内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完整形式。有些贸易语言变成了洋泾浜语言,语法和词汇都大大地简化了。在中俄边界沿线的西伯利亚一带,从18世纪到20世纪,就有一种中俄语混杂的洋泾浜。在同欧洲人接触以前,新几内亚某些地方就从当地土著语言中演化出若干种洋泾浜语言。19世纪在阿拉斯加北部因努特人与阿拉斯加印第安人之间使用过一种因努特洋泾浜,这些都是洋泾浜语言的实例。

洋泾浜语言的出现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形。某一宗主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土著居民确立了殖民统治以后,这种语言便成了交际工具。不过,这种语言往往演变成通用语,在操各不相同的当地语言的人们之间广为使用。在有许多种不同语言存在的地方这种情形尤为显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西伯利

亚北部、南美洲的一些地方便是这样。这些洋泾浜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音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当地土著居民的一种或几种语言特点，而词汇系统则或多或少地是以宗主国语言加上土著成分的混合体为基础的。沿用至今的洋泾浜语言，大多已经取代了当地原有的语言而变成了社会上的第一语言。这样的语言叫作克利奥耳语，即混合语。

不过，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洋泾浜语言虽然大行其道、广为传播，却没有能够取代或者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当地的语言。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形，由于当地的语言为数极多且差异甚大，有几种大的洋泾浜语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地居民还是忠心耿耿地坚持使用他们的本族语，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和种族特性的象征而极其珍重。

宗教和权力的信息

所谓的传教语言或教会语言则是另一种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跨语言交际所使用的语言。这是指欧洲的传教团体作为开展活动的工具而最初采用的当地语言。教会的活动扩大以后，超出了他们原来采用的当地语言的疆界，这里他们往往在新开辟的地区继续使用既定的语言，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人为引进的通用语。随着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教会活动的减少，以及原来由西方人推行的宗教活动转

入本地人之手，这种教会语言有的便变成了世俗的通用语。

与此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形是殖民地政权或征服者政权采用当地语言作为行政语言。为此目的挑选的语言通常是该地区使用相当广泛而享有声誉的语言。荷兰人采用标准马来语在当今的印度尼西亚境内作官方行政语言和一般通用语。同样地，后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当政者早在该国正式独立之前便已经决定以印度尼西亚语为官方语言了。（印度尼西亚语是以标准马来语为基础的，因此推行起来相当便利。）

也有在入侵地区推行征服者的语言的，实例之一是当年曾在今天南美洲的秘鲁强制推行印加人的克丘亚语。这是西班牙人踏上南美洲以前不久的事。

当今的或者历史上的殖民者和类似的统治者，其宗主国语言也在某些地区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通用语，即使在殖民地独立以后，这些语言仍然是通用语，通常是在上层社会里使用。在前殖民地地区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正在开始扩大，在年轻一代当中尤其明显，而其他各种通用语，特别是洋泾浜语言则逐渐被淘汰了。 ■

这幅描绘诸神诵经列队行进的萨波特克壁画（约5-7世纪），是墨西哥阿尔班山地方一座前哥伦布时期古墓的装饰物。





马来西亚半岛

在地图上标出 语言 分布情况



泰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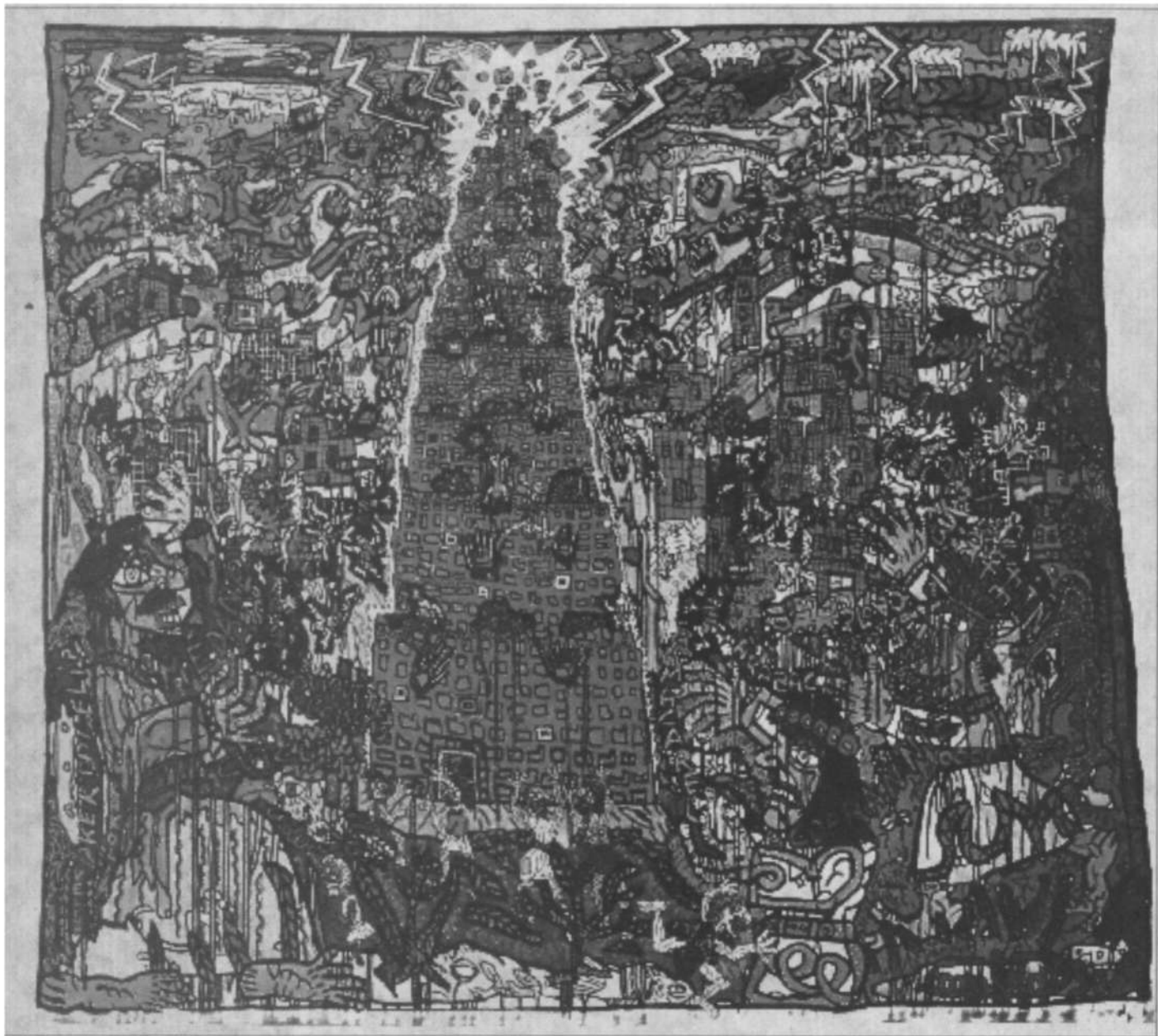


北婆罗洲

这

里有三幅明细地图,取自由斯蒂芬·乌尔姆和希罗·哈托里担任总编的《太平洋地区语言分布地图集》(1981)。该地图集是由教科文组织提供财政资助,而由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主持出版的一套丛书中之一种。丛书的出版发行促进并鼓舞了濒危语种的保护和复活工作。这是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和朝鲜的语言分布诸地图集业已出版,世界语言分布地图集刚刚由伦敦鲁特雷杰出版公司出版。有关太平洋跨文化交流语言分布、非洲语言分布及南美土著语言分布的其他地图集则尚在编辑之中。

由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与日本科学院合作(在堪培拉)出版。
发行:GEO CENTER, D-7000 Stuttgart 80, Postfach 80 08 30, Germany (fax: +49 711 7889354)。



旧话重提巴别塔

彼得·米尔霍伊泽

蒋斌译

语言的多样性是一笔财富，而人们却普遍
低估了它的价值

在 关于巴别塔的圣经故事里，诺亚的子孙力图建一座通天之塔，上帝怒其狂妄，破坏了使他们能够交流的共同语言。这个故事把语言多样性描绘成上帝的惩罚，几个世纪以来，这在西方关于语言的思想中一直占统治地位，因而许多人认为语言多种多样不是件好事。

而另一方面，我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不应看作是个问题，而应看作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因而迫切需要扭转当前危及千千万万小语种的政策和惯常做法。若不这样，就会永远

丧失从人类诸多民族长期积累的深远见识、成就和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机会。

单一语言的诱惑力

人们总是想方设法用单一的语言取代多种多样的人类语言。欧洲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曾大力追求这一目标,在19世纪后半叶,诸如沃拉卜克语和世界语这样的人造语言的拥护者也乐此不疲,这曾吸引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追随者。很多世界语提倡者不仅希望世界语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通用的辅助语言,而且希望在尔后的某个阶段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语言。

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极大地鼓舞着那些承诺减少语言多样性的人:一种共同语言往往被视作约束新兴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仅仅在200年前,法语并非是大多数在法国出生的人的母语,尽管在今天生活在法国而又不说法语的人属于人数不多且日渐减少的少数民族。过去在西欧发生的事情,如今在诸如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重演。在印尼,印度尼西亚语从一种使用范围很小的辅助语言发展成该国主要语言,不久将成为众多印度尼西亚人的母语,比其他任何语言都用得广泛。

要说选择单一国家语言经常被视作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这绝非夸大其辞。无论选择何种语言——一种像英语、法语、汉语或俄语这样广泛使用的语言,或者像菲律宾语这样的新兴语言,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它应

可以充分互译,也就是说,能够表述现代世界所需的概念和差别。但是这种对可互译语言的需求带来一种不利的副作用:毁灭年久背时、无关紧要的小语种。

在语言领域正在发生的一体化进程可与世界上动植物物种的综合相提并论。有些人出于好意——首先降低交流成本,其次解决世界上日益增加的人口的温饱——而推进这两个进程。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人对多样性的本质和功能知之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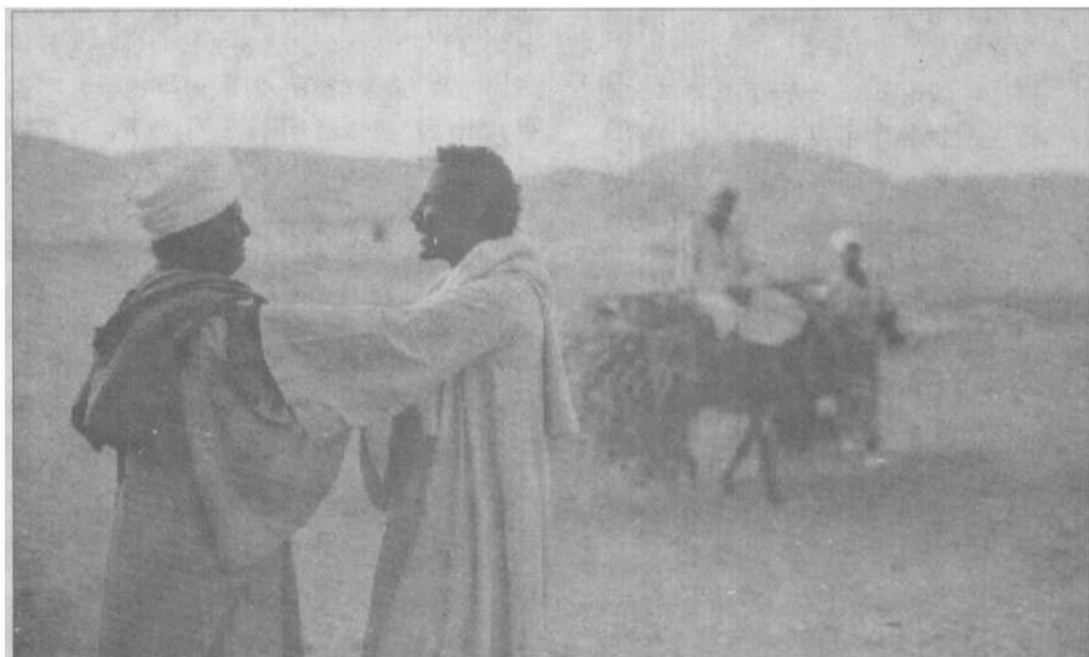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而最近,提倡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也更加高涨。不过,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尚未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也没有形成“语言生态”需要与自然生态同样予以关心的观点。然而,二者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现今的一切多样性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生物多样性以百万年计,语言多样性至少也有10万年的时间。而真正的多样性一旦丧失殆尽,重新恢复谈何容易,尽管生物工程和语言工程取得了进步,也非轻而易举之事。其次,语言多样性和自然界的多样性均属功能性,有同等重要的相似性。现存的大约10,000种语言反映了语言对不同社会和自然条件必不可少的适应。它们是日益专门化和不断调整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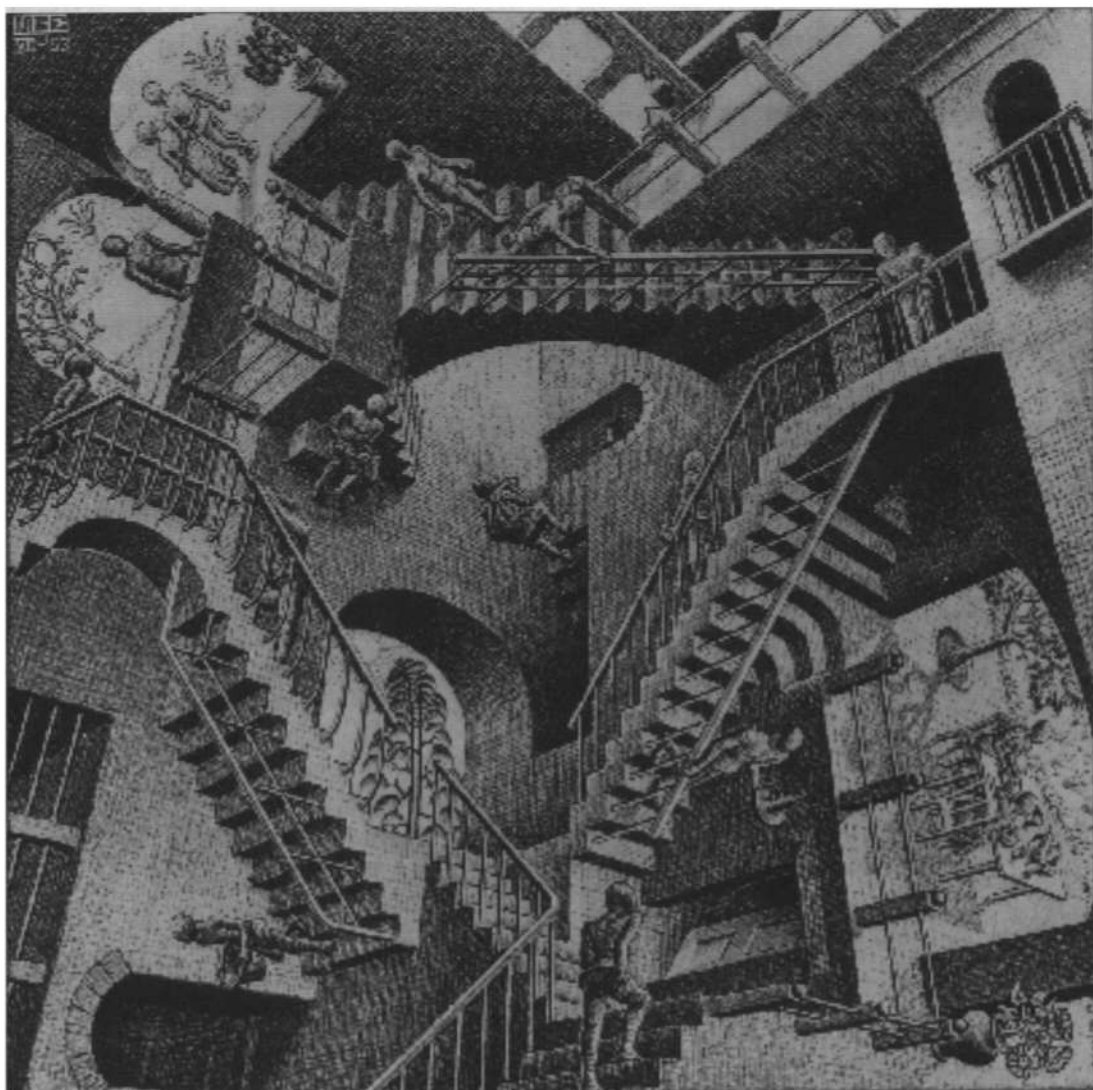
一个世界或多个世界

为了理解这一微调的性质,我们需要将语言

左图,《巴别塔》(1990),
法国艺术家罗伯特·康
巴斯在画布上
创作的丙烯酸画。

右图,在沙漠中
见面问候(埃及)。





和世界之间关系的两种理论作个对比。一种理论称作标示观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世界里,每种语言为一对应的各个部分提供不同的标签。按照这种理论,语言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所有语言皆可充分互译。

第二种理论坚持认为,主要靠语言而存在和维持对世界和世界许多部分的感性认识。因此,说不同语言的人所感知的世界是不同的。相反,不同的语言以许许多多的方式强调和过滤一个多面现实的不同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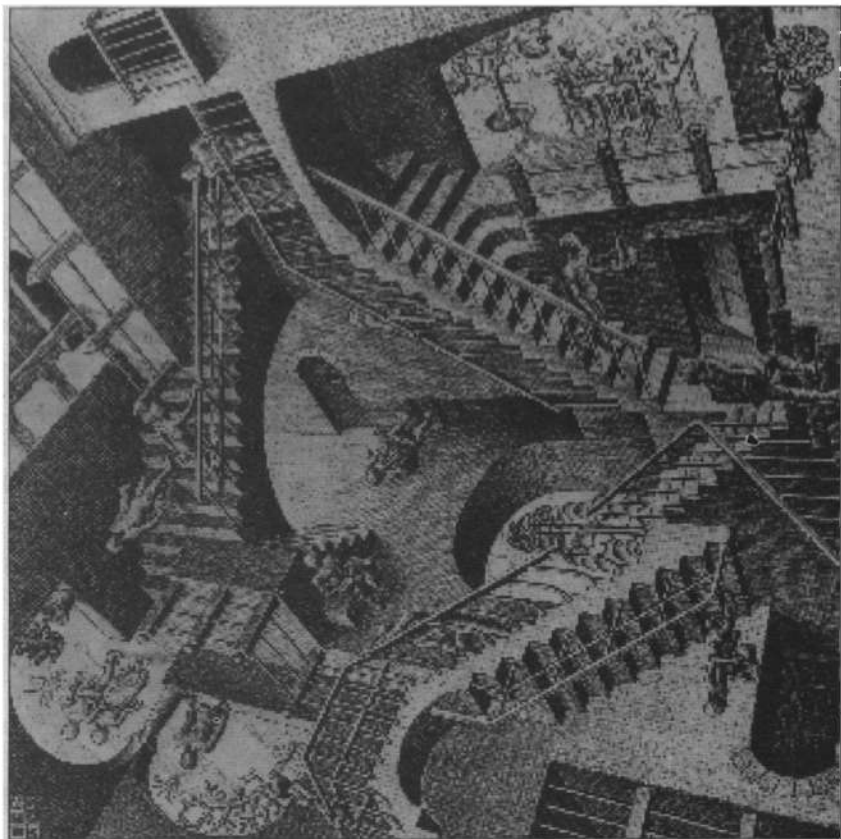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论,每种语言就可看成是对世界的暂时性解释,这个世界十分复杂,了解它的唯一希望是从尽可能各不相同的角度去接近它。如果我们认为每种语言是人们努力了解世界的漫长历史的结果,我们便可理解语言的多样性为什么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而不是进步的障碍。

不同的语言以若干方式传递着对现实的不同感知。这些包括词汇的差异、所表达的语

法信息的差异以及完完全全的真实与被视为比喻之间的不同界限。

事实上,所有人类的知识都取决于订立各种确定差异的标准。例如,医生需要知道两位病人额头上的红斑,是否是同一种疾病引起的症状。心理学家需要知道两种行为是否属同一种心理状态的表现,而生物学家则需要知道两种动物是否同属一个种类。在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判别异同的可靠标准,人们通常是靠随手可得的词汇来作出判定。

一个人所共知的领域是色彩名称。色谱中同一色区在某一语言中可能有一个名称,在第二种语言中有两个名称,在第三种语言中有三个名称。比如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没有词汇上的区别(如威尔士语中均用 *glas* 这个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并不重视这两种颜色的差别。在植物领域,又有很大的不同。在有些地方某些植物是文化的最重要因素,这种地方就可能出现惊人的词汇微调。例如,新几内亚的许多语言为不同种类的朱蕉叶作出的



《相对论》，荷兰书画、
刻印艺术家莫里茨·科尼
利斯·埃舍(1898-1972)
创作的平版印刷品。

区别达数十种之多，视这些树叶是否用于制衣、装饰、施巫术或其他目的而定。在西方社会中专家所说的次语言也可能有类似的微调，例如汽车机械师、画家、医生或银行家的次语言。

想要迅速摆脱专家们在几个世纪内逐步作出的所有这些微妙的差别会使诸如英语这样的语言变得极其贫乏，使之除常用词汇外无法谈及任何事物。逐步放弃语言的多样性可能会在全球范围产生类似的后果。词汇专家及掌握像雪的种类、有用植物种类、气候类型或对待儿童的方式这些千差万别的现象的

知识的专家都会突然消声匿迹。

语言与传统社会的解体

有一个领域为这种差异提供了许多实例，这就是亲属关系领域。人类语言学家已积累了大量证据，证明不同的语言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集中表现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的特性和差异。在英语中，“姐妹”这个词系指男性和女性两者中的女性同胞，但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克底辛语——常常反映美拉尼西亚人对世界所作解释的一种混杂语——中，“姐妹”这个词意味着不同性别的同胞。兄弟称其姐妹为“姐妹”，女孩也称兄弟为“姐妹”。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土著语言中以及在美拉尼西亚的其他语言中，称呼祖父和孙儿孙女用同一个词。在这些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标示通常意味着得到同样的待遇。这类标示增强该集体的团结。例如，给辈份不同的成员以同样的称呼可能是减少几代人之间冲突的途径。现代西方语言的词汇大多相当贫乏，不足以维系关系复杂的大家庭网，而用差异较少的西方语言取代差异较多的当地语言可能是使传统社会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同的语言间说法有很大差异的另一个领域是身体各部分的名称。在很多语言中(包括说西非语的人)，“手”这个词系指整个手臂或肘部以下的手臂。西非人“握手”时习惯于抓住别人的小臂，这是一种不同的语言组织的反映。在我自己的阿勒曼尼语中，“脚”和“腿”这两个词并无区别，在学习高地德语时，有些东西使我困惑不解，因为高地德语对二者作了区别。在美拉尼西亚，狗被说成是有两臂和两腿，而非四条腿的动物，百脚虫被看作有许多手臂而不是许多腿。

迄今列举的实例大多涉及语言在词汇方面将完全有形的现实——色彩的现实或者植物和人类的现实进一步剖析。还有一些不那么容易感知的现实，它们与语言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情感或思想状态的名称。德语中的“Gemütlichkeit”并不完全与英语中的“cosiness”(安逸富足)相对应，“depression”也不同于过时的“melancholy”(忧郁)。在某些波利尼西亚语中没有沮丧或难过这些词，似乎是不存在相关现象的反映。

语言甚至更直接地涉及到创造通向世界的哲学和宗教方法。它使得像唯我论这样的

思想总富有意义。唯我论是这样一种“观点：自我是存在的或能了解的一切”或者是用以解释宇宙如何运行的系统要素，如语言学中的“音素”或18世纪科学中的“燃素”。在传统的波利尼西亚语中，描述死亡的词很多，从最初的永久失去知觉到最终的躯体分解，不一而足。“重新埋葬”的习俗反映了这种语言差异。

语言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涉及到要求讲话者就他们说话的对象做出重要选择的方式。众所周知，在学法语时会发现，在英语中中性的单数第二人称代词“你”必须翻译成“tu”或“vous”，视客气程度或向对方表示友好而定。当使用名词时，有些语言根本没有数的差别，而像斐济语等其他语言则总要表明讲话者正在同一人、两人、三人、几个人或更多的人讲话。在新几内亚的一些高地语言中，诸如“猪拱坏了篱笆”这样的句子，就无法以这种中性的方式讲述。利用语法词尾，讲话者必须指明这是否是告知他或她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或者它是否从诸如猪粪这类间接证据推论而来或者只是道听途说。

比喻说

社会差异、数目或一份情报的可信度的表述能使人陷入有趣的窘境。人们想知道在俾俾语中，广告宣传这个词怎么说，这是所罗门群岛上讲的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一切论及无用物体的词都须加前缀，以示其毫无用处：人们怎样才能用俾俾语来描述核电站呢？必须使用一个前缀，以示一类暂不活动却很可能发生突变的实体吗？

某些语义差异的影响可能很大，它会使语言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释现实，可能被描述成受事件支配或受客体支配。许多标准的欧洲语言能视作客体支配，因为它们有一种将进行时动词转变成抽象的宾语名词的强烈倾向。例如，语言学的主要内容并不被看成说话活动，而是一种名为“语言”的客体。进行这方面调查的一个结果是：说话总要涉及人以及时空环境，而语言这个抽象词汇指的是一个客体，它能作为某种不受外界影响的事物而加以分析。

在西方语言中牢固的因果关系同样也很重要。“讲授”或“治疗”这类动词能换成“使……学习”和“使……康复”这种说法。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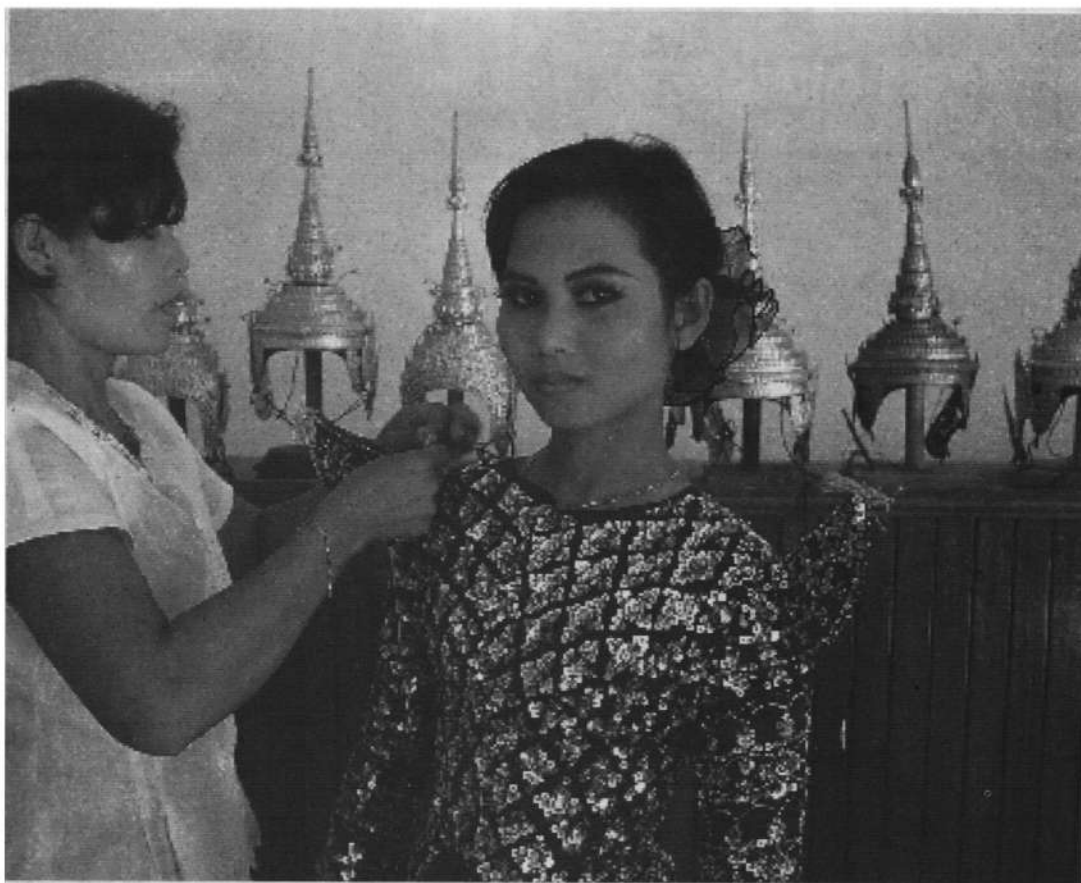
有一种完全不同而又同样有效的方式，可以看看在教室里或医生诊所里会出现什么情况，正如在温图语等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温图语是加利福尼亚州讲的一种美洲印第安语，它偏爱随同格的或者“伴随”的释义。按照温图人的观点，医生参加病人的康复过程，教师则分享学生的学习进步。我们根本看不出这类因果观一定会使教学或治疗工作有所改进。

按照这些比喻，语言最终不同于它们赖以存在的讲话者。西方生活往往为少量比喻所左右。例如，一说“时间就是金钱”就强化了诸如按小时付费等文化实践，力图依靠让人更快地做事来节省金钱，并且增强了利用时间也有较经济或不经济之分这样的观念。不用说，这一比喻不会出现在不重金钱的传统社会，在那些社会中，工作和报酬并不用“所花”时间的数量来计量。另一个著名的西方比喻是关于“法则”，人们认为有一个看不见、摸不透的宇宙之主制订了自然法则。这种隐喻如此根深蒂固，致使科学家认为这完完全全是真实的并且坚信他们能发现自然法则，只是到了最近，由于混沌学说理论家的发现，这一信念才开始淡化。研究中性网络的人士现在已开始对语言学习涉及一些规则和规则系统（这是语言学家几十年来所持的信条）这一思想提出质疑。不受世界需要受法则统治之思想支配的其他文化隐喻将来很可能在科学

右图，金边艺术大学（柬埔寨）的舞蹈家。她的服饰是一块长方形的布料，每次表演前要专门按体裁剪和缝制。

下图，塔希提妇女（法属波利尼西亚）。





思想方面实现突破。

有关环境的论文提供了说明为什么向不同的语言学习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例证。西方语言在表现环境的各个方面时有许多空白,显得力不从心。能叫得出一些食用植物名称的普通西方人与知道数百个名称的说南美印第安语的平民百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如今人们愈来愈意识到“绿色”问题,“绿色”词汇也有增无减。我们有了诸如“生物多样性”、“回收利用”和“无铅汽油”这样的词,但这些术语并不全都适用于环境论文。例如,“资源”这个词意指再生的概念既适合可更新资源,也适用于不可更新的资源,而“环境”这个词本身意指人类与其周围世界之间的划分,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的语言中并不多见。

西方语言强调人的因果性和控制,而他们的客观决定性意味着最佳行动路线是确立对小块划界区域的控制,并且像其他语言表明的那样,不要学着了解未经分解的整体。

还请注意,在像英语这样的语言中,不同类型的控制之间存在不完全分化,在物主代词“我的”能用来表示以下三种情况的场合:

A 控制 B=我的孩子(A 的孩子)

B 控制 A=我的父亲(A 的父亲)

A 和 B 交替相互控制=我的伙伴。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巴拉伊语中,这三个类别靠不同的代词形式明确区分。有趣的是,为了用巴拉伊语表示“我的土地”这一概念,要使用相互控制代词,意指相互依赖,人与土地之间需要平衡和合作。西方关于土地的比喻受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差别以及人类是享有特权的物种之思想的支配,统治者或控制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造了世界其余部分。像“宇宙飞船地球”这类最新的比喻增强了这样的思想,即地球主要是为造福人类居民而存在的,而环境管理和生态审查只不过是人类作为其余天地万物之统治者的旧图片的翻版。

我愿指出,西方人陷在他们的语言所造成的局限中,这正是环境科学领域缺乏真正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关于环境论文的实例阐明了单一语言论和单一文化论的危害,并且表明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和多种不同的语言——对于解决世界正面临的问题是多么必要。 ■

彼得·米尔霍伊泽
(Peter Muhlhauser),
德国人,

先后在柏林理工大学
和牛津大学(联合王国)
教语言学,1992 年以来
是阿德莱德大学
(澳大利亚)

的基金会语言学教授。
他是牛津纳科尔学院
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
的研究员。

尼日利亚的选择

阿约·巴姆波斯

臧惠娟 译

一个拥有 400 种语言的国家为寻找一种通用的交流工具
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发展中国家一般很少将语言问题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除非涉及到执行有争议的语言政策问题。尼日利亚也不例外,那里的人们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比语言问题更加紧迫,也更加重要。

然而,由于独立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动,使语言问题明显地凸现出来,成为尼日利亚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在制订新宪法的两届立宪会议的审议中,在讨论政治统治框架的国家辩论中,以及自 1960 年以来颁布的历次宪法中,语言问题都是一项重要内容。

像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也是一个多语言国家。全国大约有 400 种语言(方言除外),其中豪萨语、伊博语和约鲁巴语三种语言,在全国 8,850 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人使用。此外,另外 10% 的人口虽然主要讲其他语言,但至少也会讲这三大语言中的一种。

尼日利亚的语言通常被分为大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两种,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使用人数和重要性方面仅次于三大语言的是大约十种主要语言,它们是一些州使用的重要语言,如卡努里语、伊比比奥语、埃菲克语、蒂夫语、伊乔语、埃多语、富尔富尔德语、乌尔霍博语、努佩语和伊加拉语。另外一些语言也不应随便说成是“少数民族”语言,因为若把讲这些语言的人加在一起,他们在人口总数中将占相当大的比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尼日利亚有三种功能型语言:在国家一级发挥作用的大语言,在州一级发挥作用的主要语言以及主要在地方上发挥作

用的小群体语言。

多样性与分裂

一个国家拥有几种语言这一事实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内在问题,有 400 种语言的尼日利亚深切关注着由分裂和部落制所引起的问题以及需要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多语言国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即语言的多样性是与分裂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种说法极为流行,但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分裂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使用多种语言,而是由于种族剥削通过与语言差异的联系而造成的。在有些国家,人们

阿约·巴姆波斯

(Ayo Bamgbose),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前语言学教授,从事语言学研究 and 西非语言规划活动近 30 年。发表的作品包括《约鲁巴语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6 年)、《母语教育:西非的经验》(霍德与斯托顿出版社/教科文组织,1976 年)和《语言与民族》(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1 年)。



常用分裂的说法压迫讲小群体语言的人。幸运的是，尼日利亚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与分裂说互为补充的另一种论点是：单一的语言可以使国家统一。在尼日利亚，英语在殖民地时期一直是官方语言，现在则普遍认为它是发挥统一作用的最佳候补语言。英语有着牢固的地位，一直被用作进行管理和教育的语言，并由此而将各种族集团的精英“团结”在一起。除此之外，因为英语在尼日利亚不属于任何种族集团，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中性”语言。然而，一种通用的语言不会自动导致团结，除非在有关的社团之内已经存在导致团结的因素。语言根本不可能是中性的，

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特点。

自独立以来一直有三大问题支配着尼日利亚的语言政策：国家的官方语言应是什么？哪种语言可授予国语的地位？教育应采用哪种语言？

英语：占绝对统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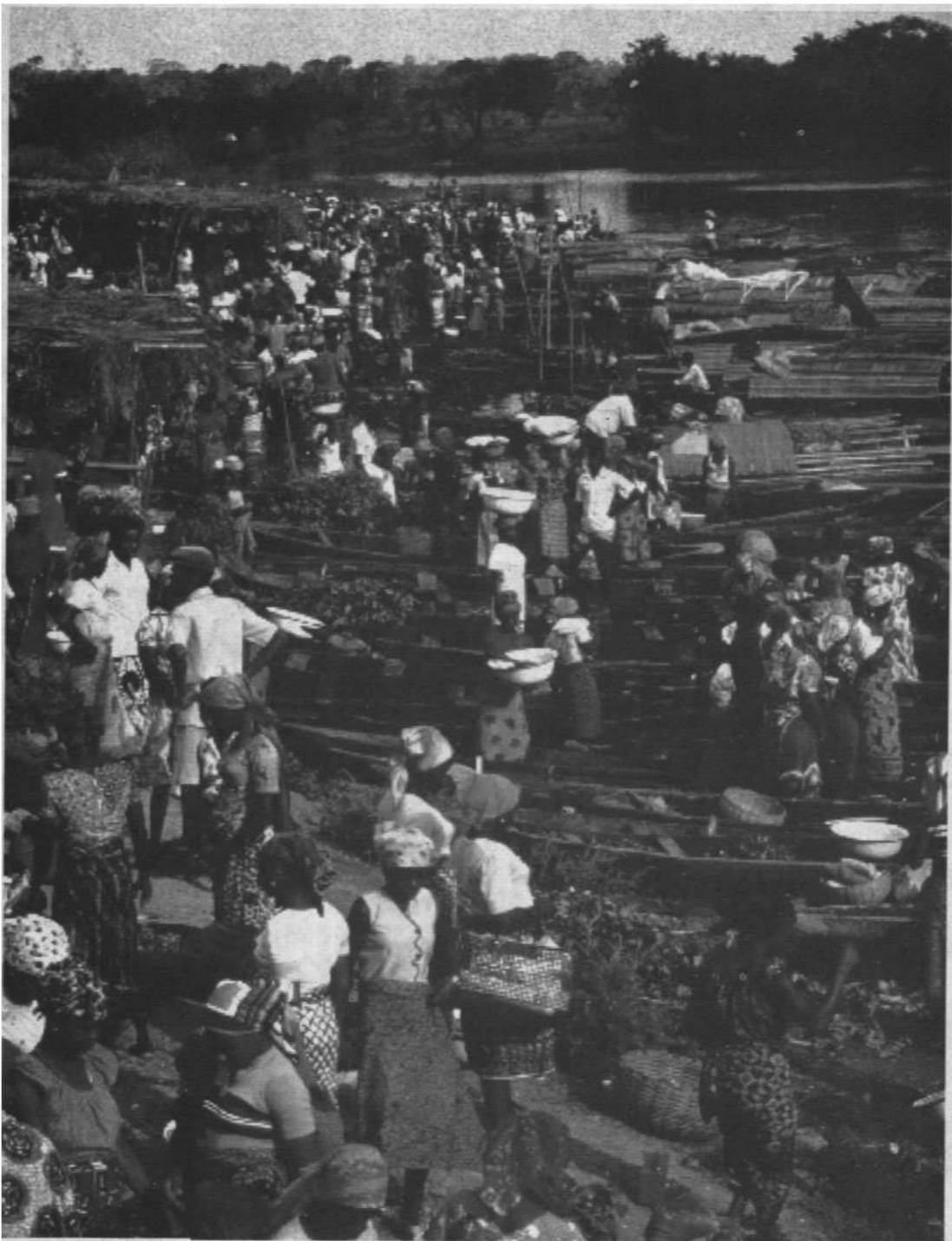
对某些国家来说，官方语言的问题是预先确定的。由于殖民地的缘故，在独立前的年代英语几乎用于所有的正式场合，要改变这一习惯做法，其可能性几乎是零。英语的确是处于

处于统治地位。英语是进行统治和管理的语言(包括国民议会和州议会的议项),几乎是各级教育都使用的语言,是传媒使用的主要语言,是科学技术的语言,是许多尼日利亚小说家和诗人所用的语言。连是否应该改变的辩论也必须用英语进行!

奇怪的是,关于少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例如,1979年宪法规定将三大语言作为国民议会的补充用语,但必须要有充分的安排。这类安排包括:编纂立法术语,培训口译和笔译人员,安装同声传译设施及印刷设备,为印制议会正式记

录雇佣人员。这些要求目前只有第一项已经完成。因此,在议会活动中并没有使用尼日利亚语。

一个经过多次讨论并反复出现的语言问题是逐步发展一种混合语,以此作为尼日利亚的国语。虽然民族主义感情保证会使绝大多数人赞成将一种地方语言作为国语,但也就到此为止了。问题的实质是在尼日利亚的400种语言中选哪一种来承担这一光荣的任务。这是由于担心再次出现统治与被统治现象,讲小语种的人们担心他们将在政治、经济 and 语言上被讲大语种的人所压倒。即使是



左图,卡拉巴尔的市场。

右图,尼日利亚某城镇墙上张贴的选举招贴画。



在讲三大语言的人们当中,对哪一种语言应成为国语也未形成共识。由于屡遭挫折,一些尼日利亚人提出了些很荒唐的建议,如将几种语言作基本要素混合起来创造一种人造语言,还有的建议故意采用一种小群体语言,以降低讲大群体语言者的优越地位,使绝大多数人处于同等不利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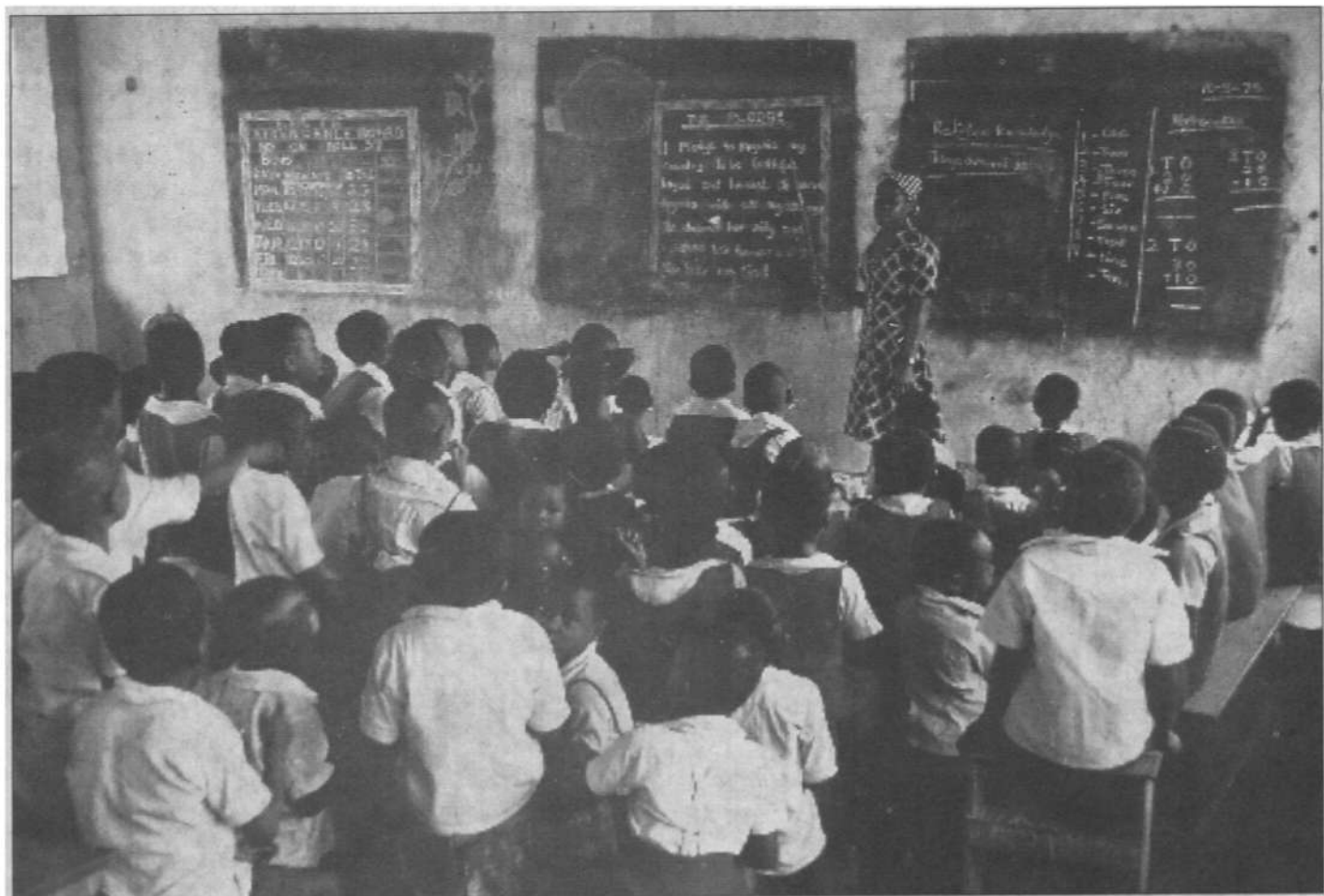
由于选择一种地方语言作为国语十分困难,致使另外一些人建议采用一种外来的非洲语言,如东非的斯瓦希里语,或者将英语从官方语言的地位提高至国语的地位,但是官方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在学校学习三大语言,希望其中的一种今后会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国语。当然,这意味着英语在尚无国语的情况下,将继续发挥国语所能发挥的作用,即使不冠以国语的头衔。正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使另外一些观察者建议尼日利亚应像瑞士那样采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国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种地区语言(罗曼什语)。虽然这样做在尼日利亚可能要花费巨额费

用,但至少是解决困境的一种积极途径,否则该国将因没有国语而将英语充作国语。

教育是变革的关键

语言习惯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教育为改变语言的使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由于这一原因,尼日利亚的语言政策有很大部分是依据教育制度而制订的。教育语言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是:获得教育语言机会均等;学生建立牢固的母语基础;牢固掌握英语;能讲两种尼日利亚语。

获得教育语言机会均等是通过以学生母语开始小学教育这一途径得以促进的,如果做不到,则用最接近的社区的语言。成人扫盲教育也使用成人学生的当地语言授课。实施这一政策后就不会仅仅因为哪种语言是小语种而受到忽视。不过,还存在一些很实际的制约因素。有些语言目前还没有文字,有些语言编写扫盲教材的有关研究尚不充分,在这种



尼日利亚南部阿巴镇
某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

情况下,则通过最接近的社区的语言进行教育。这种局面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由语言学家进行分析,且逐渐形成自己文字的语言已越来越多。

使学生对自己的母语建立牢固的基础是想通过学生使用的本族语言进行读、写、算方面的教学来提供保证,并用这种语言作为小学头三年教育的教学语言。除了上述制约因素外(这些因素有碍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家长和监护人的态度往往与母语教育的原则背道而驰,这是因为许多上层家庭都将子女送入用英语教学的免收费用的学校读书。

牢固掌握英语是通过在小学一年级便学英语,并在以后学生教育的其他阶段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一手段加以促进的。尽管已将大量时间用于英语学习,但还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尼日利亚的英语水平很低。学校结业证书的成绩记录以及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往往都不好,由此可以证明英语学习的不足。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看来是由于母语教学与英语学习脱节。在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教学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关键不在于学习英语的时间长短,而是学习效果如何。

目前实践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是认为每一

个小学教师都能教好英语。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有些小学教师的英语口语和写作水平都很差。采取专职英语教师与用母语教授其他课程的教师共同授课的方法,在掌握英语和母语两方面效果都极好。

每个尼日利亚儿童不仅要掌握自己的母语,还要掌握三大语言中的一种,这一要求意味着要促使最终出现一种尼日利亚的混合语言。这一政策要在中学阶段得以加强,但要是否具备师资力量。许多学校都以这一“但是”为由,暂避一时,一些州政府也并未努力培养教授尼日利亚大语种的教师。相反,他们采用一些最易选择的替代方法,如请一些未经训练的讲本族语言的人仅讲授该语言的口语形式,结果极糟。对于这一政策,执行的热情看来并不高,这可能与对国语问题的矛盾态度有关。

在尼日利亚,人们已敏锐地意识到了某些最主要的语言问题。并且全力以赴地试图通过制定适当的语言政策予以解决。目前所缺乏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决心。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这些政策缺乏信心,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决策者本身也信心不足。 ■

绿色观察哨

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1994年5月



吴哥窟能拯救吗？

弗朗斯·贝奎蒂

许天天 译

古迹修复者决定把部分吴哥废墟留在大树的巨掌之中。图中一棵木棉树的根部紧紧缠住了达巴姆庙的石壁。

在飞机翅膀下，只见宽阔的沼泽地沟里飞着几只白鹤，三条矩形覆顶的长廊、一级级的平台和五座高耸的雕琢而成的吴哥窟塔沐浴在全黄色的夕阳余晖中。我们获准飞越这座碑牌林立的庙宇，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吴哥，在古高棉语中，“吴哥”意指“城市”或“首都”。

在位于柬埔寨东北部库伦高原和洞里萨湖（“大湖”）之间的这片200平方公里的平原上，9至12世纪间的12位高棉统治者建起七座都城，其中处处有庙宇。有的城市隐于森林中，由于红色高棉的出没，这些城市变得更难以接近。红色高棉在1975年到1978年掌权，杀害了

吴哥窟能拯救吗？

约 100 万柬埔寨人，以后把这靠近泰国边境的地区作为自己的避难所。由于诸神才有权住在砖石建筑中，古代都城中的庙宇才得以保存下来，而用木头建造的宫殿和住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协调旅游业与古迹保护

是大自然而不是人类的恣意妄为使这些典雅异常的碑林受到破坏。热带气候的湿热促使木棉和无花果树疯长，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树的根动摇了石碑的稳固。

现在，主要的庙宇已摆脱了这些植物的缠绕。只有塔波哈姆庙被有意留在浓密的灌木林深处，在 19 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夏尔·布耶沃和博物学家亨利·穆肖先后发现了它。自 1898 年也就是法国远东学校成立那一年起，考古学家们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从未中断过。他们耐心地清除长在大树下面的灌木丛，拆除并重新修复这些纪念碑，在 1908 年创立了“吴哥保留地”，把濒于毁灭的神像迁到这里。

该遗址的前任馆长、法国远东学校的贝尔纳·菲利普·格罗利埃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处古迹能在建筑物的数量、规模和完美上与吴哥建筑群相

媲美。”但这一名胜古迹处境极其危险，1989 年柬埔寨四个主要政党要求教科文组织对国际上保护吴哥名胜的行动进行协调。1992 年 12 月，吴哥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考虑到保护吴哥窟涉及的问题成堆，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列入吴哥窟提出了几个条件，强调应该制定保护工作的法律框架和管理方案，并建立一个掌握人力、财力、物力的机构来管理整个吴哥地区。教科文组织的首要工作是帮助柬埔寨政府建立国家遗产保护局，该机构在 1993 年 2 月已被正式批准成立。教科文组织还与柬埔寨政府及一个国际专家组一起为地方当局、捐赠者、当地群众和观光者制订了一项分区及环境管理计划。这份内容广泛的文件把吴哥的遗迹和破坏遗迹的危险因素都考虑到了。

从生活在废墟中的大量蝙蝠的粪便中滋生的苔藓、微生物和细菌，对考古学上的这些瑰宝危害最大。分区及环境管理计划同时指出了雨季降雨、植物、地下含水层的变化对建筑物的稳固所造成的破坏。还有一些因素，如砍伐森林后农业的无限制发展，成千上万旅游者的光临以及淘汰那些达不到国际标准的现有设施而兴建

的饭店。这一地区急需旅游业的收入，但同样可能受旅游业之害。吴哥被旅行社视为“新”的旅游点，并列入到泰国、老挝和越南的旅游路线中。

暹粒是游览庙宇的必到之地，统计表明，1992 年有 3.5 万游客光临。如果预测正确的话，在今后五年内，将有 30 至 70 万外国人和 10 至 50 万柬埔寨人来吴哥观光。这个数字意味着一个颇为巨大的市场，14 家大联营饭店已期望从中分享利益。但自先前两家饭店不考虑古迹景观便在吴哥窟沼泽沟边修建起来后，人们的忧虑逐渐加深。（这两家饭店后来已被红色高棉焚毁。）难道这里充斥游艇、游乐场和霓虹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吗？

为避免这一地区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产生此类亵渎神圣之地的行为，分区及环境管理计划建议把吴哥划分成若干地区。吴哥公园群由五座古都组成，其中包括吴哥窟，大吴哥和波列坎，它们将得到最严密的保护，这个公园群位于吴哥文化保护区中。另一方面将不限制新的居民移入这块已有 35 万人口的地区，也不限制他们采用的农业及森林管理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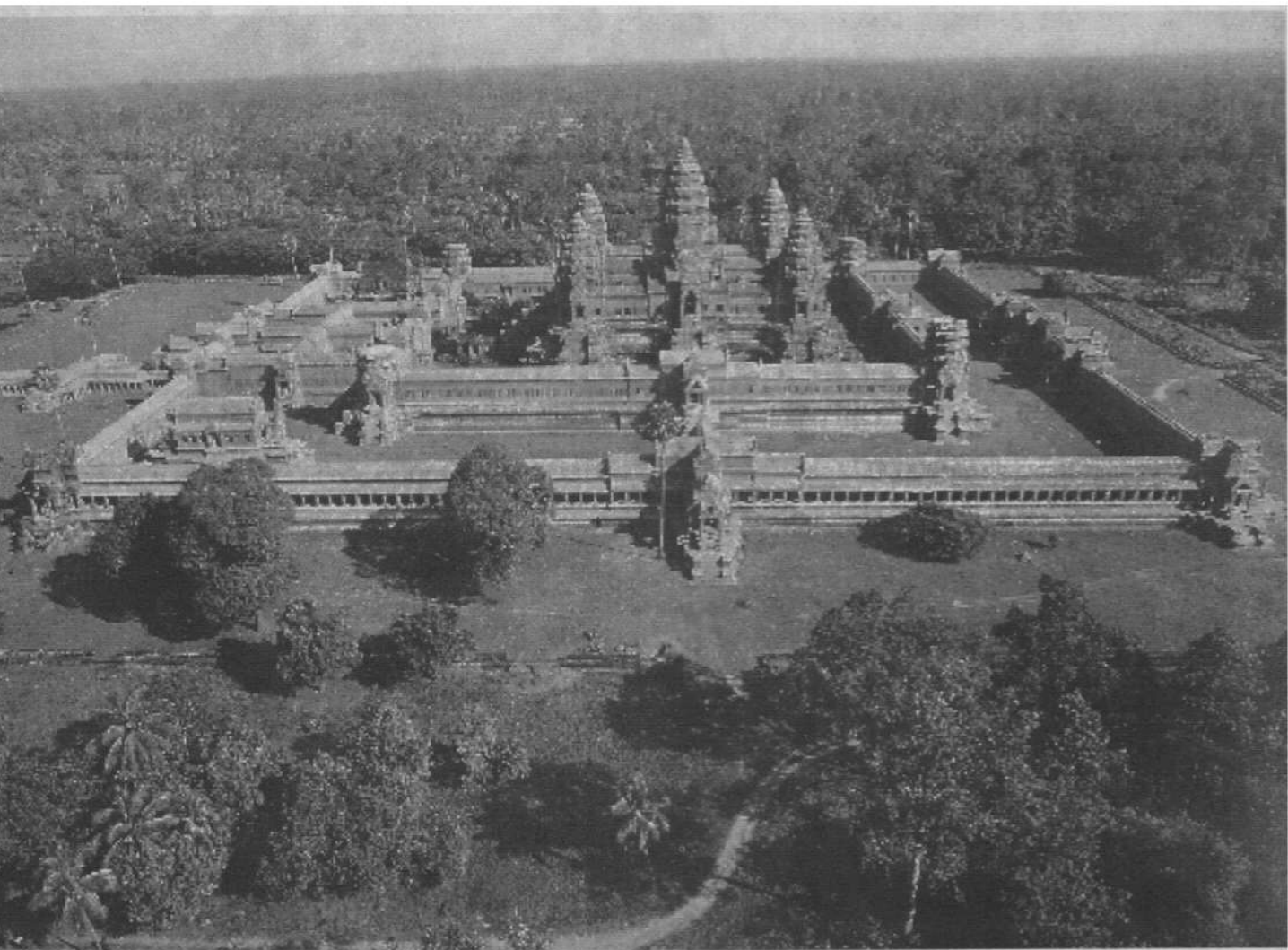
一条通过布雷区的路

在吴哥重新获得“水都”美名之前，水资源管理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早期吴哥王朝的繁荣是与灌溉紧密联系的。由堤坝和运河构成的水利网曾起着控制洪水的作用，并在旱季从各大水库引水，现在除了西部水库外，其它水库都已废弃，西部水库在本世纪得到重建。庙宇边的濠沟不仅是神圣的边界，还是水和鱼、莲等食物的来源，莲子含一种粉状物质，可以做面包。然而，现在的濠沟淤泥塞积，杂草丛生。

还有更直接的危险威胁着吴哥地区。据估计，在柬埔寨北



暹粒保护区内的雕像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以防止被盗。



空中俯瞰高棉建筑(12世纪初)
杰作吴哥窟神庙。

部有1,200万枚地雷。法国科弗拉斯公司训练了一批柬埔寨排雷部队,试图清除位于吴哥地区的八个雷区。有360枚地雷已被启出。现在你如果想去达聂庙和大吴哥东门(即所谓“死亡之门”),唯一的办法是跟着排雷小分队走。难以计数的成年人和孩子已被地雷夺去了生命或是炸断了肢体。另外,训练有素的红色高棉武装分子控制着周围地区,他们通过零星的偷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防止塑像被盗走,庙宇遭破坏的程度逐年加重。盗贼们把阿布沙罗斯女神等飞天美妙的脸部用凿子撬松,把头切下来,有时甚至把整座雕像都盗走,超过一吨重的雕像也不放过。柬埔寨政府、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的抗议对文物商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些文物贩子知道雕像在哪儿可以卖出大价钱。

柬埔寨政府委托教科文组织协调国际援助的工作困难重重。目前只有一项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即法国远东学校对麻风王梯形平台的勘查。如果没有保护古迹的国际协调和政治决心,吴哥就可能完全落入唯利是图的商人之手,他们会利用旅游者的好奇心和当地百姓的贫困获取暴利。

吴哥在人类的心目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但愿国际社会赶快警醒,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以拯救、保护并合理开发这独一无二的宝藏。

弗朗斯·贝奎蒂
(France Bequet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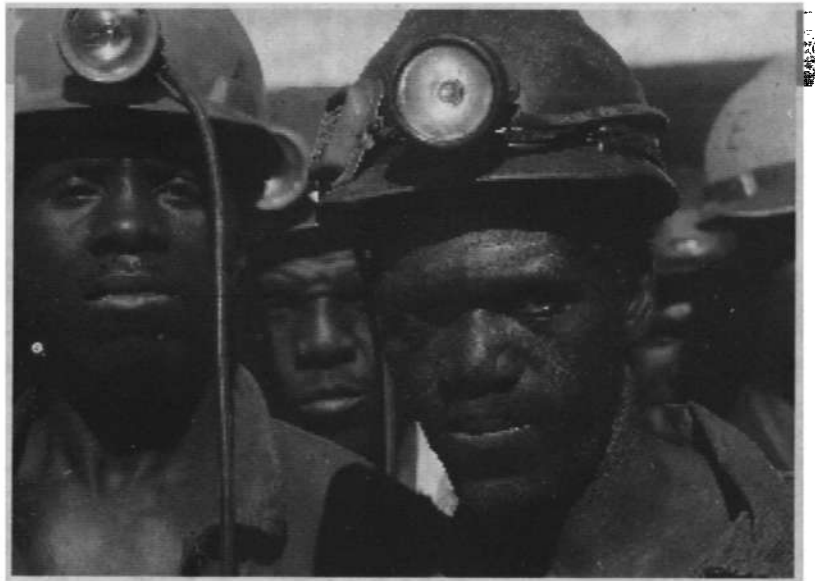
法裔美国记者,专门报道环境问题。自1985年以来,她参与培训非洲新闻记者的沃纳德-教科文组织计划。

人们采用一种传统技术,用火把树液烤出来。这种树液用作照明的燃料或船缝填充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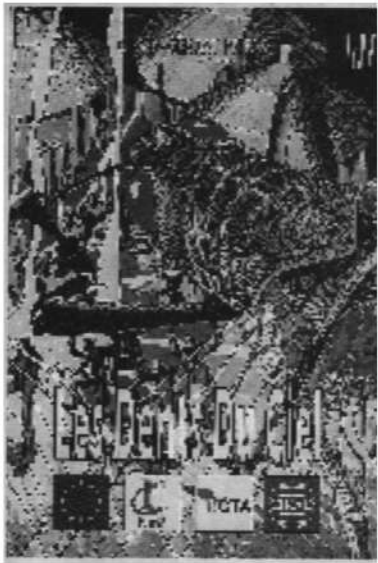
矿物尘埃的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全球数百万从事采掘、冶炼和使用矿物的工人的健康有可能受到危害。那些长年接触矿物粉尘的人吸入大量尘埃,留存在肺里,这些粉尘会导致肺尘病(如矽肺和石棉肺)、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癌等恶性疾病。伤害程度取决于与矿物粉尘接触时间的长短。在津巴布韦金矿、铜矿及铬矿工作20年或更长时间的工人中,20%患有矽肺病。在印度,50%以上的石墨工人,35%的采石工人,30%的铅锌矿矿工患有矽肺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加强工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但在贫穷国家这一条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做到。值得尝试的第一步也许是对采矿方法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



沿岸农村读者。目前已印制50,000册,可免费索取。如欲了解详情,请写信给:CIRAD/PRIFAS, BP5035, 34032 Montpellier Cedex 1, France。

方面的问题,如核能、生物多样性、酸雨及温室效应。多项选择测试是该书的一大特点。此书作者是弗朗索瓦·卡扎莱斯,由巴黎环境出版社出版。



环境问题入门

教科文组织向《初级环境读物》一书提供了一批图片材料,这本新书以一般读者为对象,介绍了主要的环境问题。该书对全球环境作了一个总的概述,然后列举了一系列事实阐述各

海洋生物面临的威胁

两个世纪之前,一种重达十余吨的施特勒海牛在北太平洋的冰冷海水中安宁地生息着。但在被人类用鱼叉猎捕仅仅27年后,这种温顺的、肉质鲜美的动物就灭绝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海洋生物保护中心出版了一本名为《地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新书,该书指出目前海洋生物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急需采取行动来保护整个地球海洋的生物链。过量捕捞海洋动植物和污染造成了最明显的破坏,但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拖网捕鱼、沿海地区大兴土木,域外物种的输入,还有向大气层排放的物质增多,使紫外线辐射加剧,造成气候变化。《地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一项使保护工作成为决策的战略》一书得到了世界银行的部分资助,由40个国家的100多位作家撰稿。如欲得到此书,请按下列

灭蝗动画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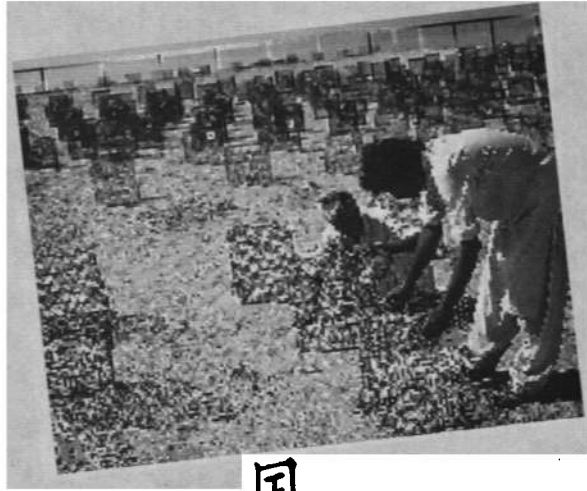
布卡里是萨赫勒地区的一个小农场主。铺天盖地的蝗虫毁了他的庄稼,他不愿意束手无策地观望,便去听一门化学剂灭蝗的课程。在学会了如何使用杀虫剂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并把所学知识传授给了乡亲。这是一本彩色连环画中讲述的故事,该书由法国农艺发展研究国际合作中心出版,用法文写成,面向萨赫勒及几内亚湾



创 举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一个关心保护地球的联盟

地址联系：the Center for Marine Conservation, 1725 DeSales Street, NW Suite 500, Washington D. C. 20036, U. S. A. (价格为 27.50 美元)。 ■



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海滩上的一个露天绿海龟孵化场。

不丹宠鹤

在 1600 年，一个不丹僧人在贾卡一座正在修建的庙宇附近看到了两只黑颈鹤，自那一天起，这种鸟就一直被不丹人视为神物。这种鸟在 10 月从西藏飞来，直到 3 月才离去。在鹤觅食的山谷中，当地居民满怀敬畏之情对待它们。大批前来观赏的游客总是太靠近鹤的栖息地，闪光灯或火把常使鹤受到惊吓。当地百姓建议游客不要打扰鸟类，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去年有 175 只鹤光临波布嘉卡山谷，而 1992 年只有 139 只。 ■

一个鲸保护区？

去年在京都召开了第 45 届国际捕鲸委员会会议，多米尼加、格林纳达、日本、韩国、挪威、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所罗门群岛投票反对国际上继续禁止商业捕鲸。挪威随后强调指出，它之所以捕杀 296 只抹香鲸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据估计，大西洋东北的抹香鲸数量约为 8 万只。）今年在墨西哥的国际捕鲸委员会会议之前，有希望通过一个在南极洲建立南大洋鲸保护区的建议。在此期间，鲸的生存状况依旧十分严峻。 ■

国

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玉米地中一幢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的大楼里。这个颇有影响的团体是 1948 年由教科文组织和法国联合创建的，由 62 个成员国，99 个政府机构和 575 个非官方组织组成。在全世界还有 6,000 个专家志愿为其工作。在 1991 年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编写的《关怀地球》一书中，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如果该文件阐述的战略能够实现，它将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发途途径处在大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但这是一项浩繁的工作：“在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森林面积已减少 600 万平方公里……；水的提取量已从每年 100 立方公里上升到 3,600 立方公里……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已使大气中的甲烷增加了一倍多，二氧化碳增长了 27%，并显著破坏了平流层中的臭氧层。”

尼日尔的图阿雷格游牧民在阿伊尔断层山的一口水井中打水。



面对这种状况，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与各国政府合作，为约 50 个国家编写了国家环保战略。为了提高效率，它已日益分权；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秘书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现在已到世界各地和国家的办事处工作。加强地方工作也有助于吸引当地百姓参与，这是使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唯一途径。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首要任务是拯救濒危物种、保持生物多样性、管理栖息地、保护沼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例如在刚果，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帮助规划管理孔夸蒂动植物保护区及拉卡塔拉的大片沼泽林。在哥斯达黎加，较小的托尔图格罗国家公园四周是大西洋沿岸最后一处低地热带雨林区，雨林面积每年减少 8%。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和该国政府及欧洲委员会合作，劝阻当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减少对香蕉种植园施用杀虫剂，并停止向森林地区扩张种植园。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最大一项国家计划是在巴基斯坦实施的，该国在 1992 年 3 月采纳了一项国家自然保护战略。它所倡议的新政策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继续执行，第八个五年计划首次对环境保护作了规定。自 1987 年起，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还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实施了另一项大的计划，帮助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乍得的政府编制国家自然保护战略和沼泽、森林、半干旱草原及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计划。这些计划都强调了取得当地居民支持的重要性。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不仅向各国传授经验，也向非官方组织、团体及个人传授经验。该组织不断出版各种文献、书籍、小册子和公报，其中很多以多种语言出版。如欲了解更多的信息，请按下述地址联系：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IUCN at 28 rue Mauverney, CH-1196 Gland, Switzerland (Tel: 41 22 999 00 01; Fax: 41 22 999 00 02)。 ■

西伯利亚语言的消亡

弗拉基米尔·贝利科夫

郑朔译

今天,世界上许多语言正面临消亡的危险。

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

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威胁

尽

管世界上许多地方文化的变化通常是自发的,但在俄国它却是共产党决策的直接结果。在共产主义革命后不久就宣布实行一项“文化工程”政策,目的是发展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与传统,以便建立一种“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共产主义的”新型文化。

这项政策在初期的确取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主要由瑞典人聚居的一个小村庄,当地政府使用瑞典语作为官方语言,出版过吉卜赛语文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一本)小学识字课本,国家还资助西伯利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移民小社区用本民族文字出版报刊。的确,有一个时期,“繁荣民族文化”已成为共产党官方宣传中的套语。

文化的同化

不幸的是,到了30年代中期,鲜花开始凋谢。当局发现它们的政策并未加速共产主义的发展,还往往起了阻碍作用。虽然从未公开宣布,但却开始鼓励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同化政策。

在全国很多地区,特别是传统上受俄罗斯正教会影响的地区,各民族农村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大,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也不是很明显。在这些地区,文化同化是个缓慢而稳步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与文化的界限逐步消失了。

例如,在欧洲俄罗斯北部伯朝拉河下游

堪察加半岛的驯鹿队。



两岸居住的当地居民中，芬兰—乌戈尔族的科米人占多数，但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中间就杂居着俄罗斯人。住在该地区的俄罗斯人的数量日益增加，语言的影响也日益增强。最后，学校系统中开始采用俄语，当地的科米人也就成为使用双语的民族。

多年前，我碰见一个科米渔民，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而以一句不同寻常的话作为故事的结尾。虽然讲话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使用的词根和助动词都是俄语，尽管语法还是科米语语法。这句话大体是这样的：Takoff-tim ring-se and findout-tim that duck-ys spend-winter-toma France-yn。（在这句英语化的句子中，保留了我的交谈者所使用的科米语词尾）。

我已经有 25 年没有去过俄罗斯的那个地区，不能肯定这种方言是否仍在使用，但是即使仍在用，它也已经受到俄语的强烈影响，因而不再能成为维系科米文化的有效工具了。这种语言的混合物即使作为基本交流手段也无法同俄语竞争，特别是因为在 70 年代有成千上万人来到这个地区的油田干活，而且有许多科米渔民已成为产业工人。

这个故事说明在文化的同化过程中语言变化的典型过程。然而，这还不是各文化间接触的唯一可能结果。如果两个民族突然接触，而两者又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那么其中一种文化很可能会迅速消亡，特别是如果一般认为它不如另一种文化威信高的话。丧失文化可能给弱小民族带来悲惨后果。它通常会使得社会内部普遍感到痛苦，犯罪率提高，大范围酗酒，并使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文化上孤立的人群甚至会消亡。现在散居在西伯利亚泰加森林深处和遥远的北极冻土带的许多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就面临着这样的威胁。



文化消亡的威胁

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俄罗斯人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被称为西伯利亚的地区。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地区并不是外国领土。几百年来俄罗斯都没有东部边界，其开拓者只是一个劲儿地朝东移动。他们大多数人永久定居在西伯利亚南部一块狭长的土地上，在那里种植庄稼，极少数定居在更北地区的人还往往忘掉他们的俄罗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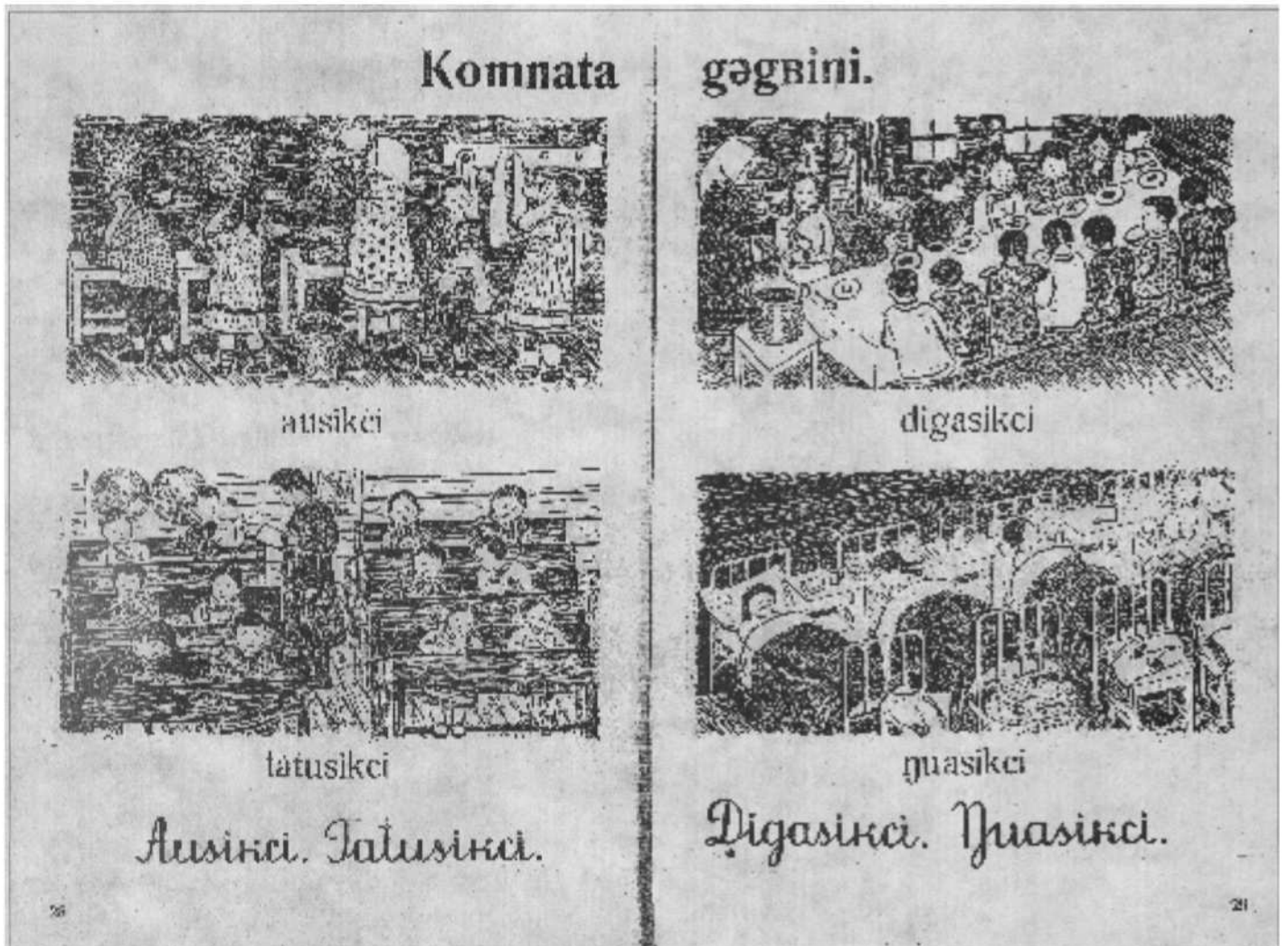
3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北方的木材和矿产资源的重要性，而在此以前，当地的社会还是很稳定的。它们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但女孩从幼年时起就从她们的母亲那里学习女红，男孩子则从父亲处学习扮演男人的角色。祖父母拥有绝对权威，任何重要问题——治病、找寻隐藏的东西、把亡灵送上西天——都

是在萨满教巫僧的帮助下解决的（萨满一词来自通古斯语）。

1924年，随着援助遥远北方民族委员会的成立，情况开始有了改变。该委员会后来成立了一些行政部门，帮助各民族把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共产主义方式——“在一代人的生活中一步登天”。

20年代后期，第一批俄语教师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当时的小学课本至少用13种北方语言编写而成，但内容都一样：列宁和斯大林的传记，掠夺成性的沙皇政权的罪行，革命英雄的业绩，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成就。

在西伯利亚少数民族阅读的书中也有一部分涉及本地事务。主要精神是老年人缺乏真正的知识，他们的习惯都是错的，传统文化是一大堆充满愚昧和偏见的垃圾，萨满教巫僧是反革命的奴仆，他们欺骗人民以达到卑劣的目的，并阻挡共产主义的发展。





右图,一个科米说书人。

左图,乌迪赫语识字课本中的插图,描绘的是寄宿学校生活。该书于1938年被当局焚毁。

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想过共产主义思想对传统的渔猎采集社会有什么意义。据说集体化和工业化将构成他们新文化的经济基础,而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则被宣布为反动的。因此人民被剥夺了土地与河流,而这些却正是他们生活的基础。

人民公敌

在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时,土著语言有时仍在被使用,特别是在学校。然而,到了1938年,第

一批乌迪赫语著作的作者和翻译者尤金·施奈德被谴责为“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并被枪毙。有位给我提供情况的人还记得克格勃工作人员如何来到他们村里,把各家各户和图书馆的书都收集起来送到院子里,然后付之一炬的情况。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到了早上,给我提供情况的这一位(当时还是个孩子),设法偷出了一本已烧剩一半的他喜爱的民间传说。乌迪赫的书面语遭到了禁止。

由于颁布了一项新政策,其他许多种语言也很快遭到厄运。根据这项政策,孩子们要



上左图,科米驯鹿牧民在冻土带的宿营地。



上右图,科米自治共和国首都瑟克特夫卡尔的住宅区。

离家去寄宿学校学习。最初,寄宿学校打算收那些半游牧民族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由于放牧北极地带的驯鹿或捕猎野生动物而散居在大片大片土地上。但不久在大一点的村子里也成立了寄宿学校,孩子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同他们的亲属呆在一起。

俄语逐渐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有时还禁止孩子们在学校里讲母语。父母没有提出抗议,不过,即使抗议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他们的孩子认为他们落后于时代,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已经破裂。甚至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民间传说也湮没了。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远地区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地方政府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无论是他们还是俄国共产党官员都不重视传统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后来,在1957年,共产党颁布了一项“关于进一步发展北方各族人民经济与文化的措施”的决议,宣判了西伯利亚许多语言的死刑。

不可逆转的过程

该决议中的一项关键措施是合并各少数民族的居住点并将它们转移,这就意味着关闭古老的小村庄的学校、商店和医疗站和强制性的重新安置西伯利亚各少数民族。采取这项措施后,人民被剥夺了传统的渔猎场地,分散居住在大量的新来者中间。结果是,即使获准正式领土自治的民族在新居住点内也成了少数民族。楚克奇自治区民族的组成历史就是一例。1926至1989年间,这个区的人口总数增加了11倍,从1.5万人增至16.4万人。同一时期,楚克奇人却从占79%降到占2.4%,而俄罗斯人和其他新来者则从占2%增至占95.3%。

这些日子,民族语言的知识程度取决于使用该语言地区的一般民族生态状况。民族语言的书面地位并无很大变化。两种西伯利亚语言——奥洛克斯语和恩干纳桑语——的现状在这方面提供的例证极说明问题。这两种语言无论在学校或出版物中都已不再使用。

奥洛克斯人的家乡在萨哈林岛对面的大陆上。30年代在修建铁路、新城镇和海港的过程中涌入了大量俄罗斯人。传统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已无立足之地,年轻人除了学俄语外已无学任何其他语言的必要。因此到1989年,只有15%的奥洛克斯人对他们的民族语言有些起码的知识。

另一方面,带着驯鹿在泰梅尔半岛四处漫游的恩干纳桑人,直到不久以前都还保持着他们的许多传统习俗和文化。他们土地的特点是极为恶劣的北极气候,几乎没有人愿意来这里移民。直到60年代,连寄宿学校制度也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1989年的一次调查表明,90%的居民对他们的语言还多少有点了解。

近年来,在前苏联的许多民族中,改革推动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复兴,但在西伯利亚少数民族中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几十年来,有才能的西伯利亚青年被俄罗斯文化所吸引,离开了他们的土地。他们有些人在城里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回到遥远的北方当教师和医生。但他们均已失去了民族特性。

恢复西伯利亚本地语言和文化的努力现在注定要失败。人们羞于讲他们的民族语言甚或把自己同俄罗斯人区别开来。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人是最好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将更加美丽”,他们解释道,“更加幸福。”

弗拉基米尔·贝利科夫
(Vladimir Belikov),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太平洋部高级研究员。
自1989年起就在编写一套
有关俄罗斯远东乌迪赫
少数民族语言的教科书。

小鸡与香蕉

陈庆征 译

在

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群岛(从前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之间,有个火山群岛圣克鲁斯群岛。那里的人们使用着世界上最独特的语言。这些语言属于一个人数很少且内部通婚的部族,人口总数约5,000。他们的语言以卓越的分类方式而著称,把世界万物分门别类精细地加以划分,总共约40类,每一类都用一个专门的前缀来表示。

其中有些词类反映复杂的思维方式。例如在俚语中, paa 的基本意思是“碎片”,但它总是和门类前缀一起出现。它可能和 nyi 这种表示尖利物体的门类前缀组合成 nyi-paa, 意为“碎屑”,或照字义译为“尖利的碎片”。前缀 no-, 归类于与整体似断似连的局部物体, no-paa, 意即“从树干上剥离的树皮”,或直译为“若断若连地仍依附于它们所属的,并由它们所组成的整体上的碎片”。又如前缀 nyo-, 属于“向远方移动”的门类,以它为前缀时, nyo-paa 则意为“一种箭”,或者更精确些,意为“移向远方的碎片形物体”。前缀 te, 代表外来的东西,特别是波利尼西亚所出的, te-paa 是“钉子”的意思,按字面翻译成“外来的金属碎片,很可能源于波利尼西亚”。

另一个这样的词是 -modyi, 意思是“右手和力量的概念”,它也只与这类前缀一起出现。当它与意为“通过劳动和努力而得”的门类前缀 lo 组合时构成 lo-modyi, 意思为“小手斧”,直译为“用某人强壮的右手使用某物,通过劳动和努力来得到另一物”。而当它与另一个意为“伸向远方”的门类前缀 mo 构成 mo-modyi 时,词义便成为“舷外装有桨托架的小独木舟”,如果直译,则为“用某人强壮的右手划水使之驶向远方的某物体”。而代表“红树属植物”的门类前缀 oyà-和 -modyi 构成 oyà-modyi, 则意为“一种木质非常硬的红树”。

这种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很多名词都基于动词来描述,并加上一个门类前缀一起出现,如动词 va, 意思是“正在发育中的”,当加上门类前缀后,便会构成许多单词。如加上阳性门类前缀 gi-, gi-va 即为“男婴”。加上阴性门类前缀 si-, 组成 si-va, 则是“女婴”的意思。而另一个词 me-va 意思是“人的



婴儿”,(me 是集合名称人的门类前缀)。Pi-va 意思是“青少年”。(Pi 是发育一半的人的门类前缀)。Vä-, 是小鸡门类前缀,所以 vä-va 就是“小鸡”。而鉴于 u-是香蕉门类前缀, u-va 则为“还没成熟的小香蕉”。

vä-va(小鸡)和
U-va(小香蕉)

如此复杂的类别系统也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只不过没那么多而已。圣·克鲁斯群岛的语言还多了一个非常复杂,完全不同的表示所有权的门类系统,即以被拥有的物体来决定,在为数众多的所属门类中,哪一个门类应在某一情况下出现。例如,如果有人想说小鸡是他们的,表示“我的”这个词将视这只小鸡是食用鸡还是宠物而不同。此外,代表小鸡的门类前缀也必须加上已选好的“我的”门类前缀。

动词也用前缀来表示门类,即根据有关的动作是用某人的手、工具还是刀来进行的而各不相同。例如, vä-gate 意思是“用手撕开”,而 tä-gäte 是“用工具撕开”的意思,那么 lä-gäte 就是“用刀切开”。其他前缀表示其他的用力量来完成的动作,或者构成一个单独的猛一下的强烈动作,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系统,即用动词来准确地表示以说话者为参照物的动作所发生的地点(即近的,有一段距离的,后面的,在受话人附近,离说话人和受话人都不近,等等);有关说话人和受话人的一般指向(向上或向下);动作的方向(朝着说话人或听话人或第三者)。

本文由斯蒂芬·乌尔姆根据圣克鲁斯群岛语言的使用者,特别是帕特里克·布瓦科罗,约翰·米略和伊尼·莱普利所提供的材料汇编而成。

对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来说,克服文化差异
同学习一门新语言一样令人伤脑筋



赠礼和失礼

贾田

张承泉译

最

近,一个已在澳大利亚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妇女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她到澳大利亚后不久(当时她的英语已很流利),正赶上过生日,一个澳大利亚朋友邀她共进晚餐,以示庆贺。她到朋友家后,朋友送给她一件包装漂亮的礼物。她再三谢过朋友后,就将包裹放在了一边。澳大利亚人对她的反应大惑不解,问道:“你不想打开它吗?”这位中国妇女回答说:“呵,不,不!我现在不想打开!当然不!”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她在无意中犯了一个“文化错误”。在中国文化中,不当着送礼人的面立即打开礼物,一般被认为是基本的礼貌行为,而盎格鲁-澳大利亚文化的观点却恰恰相反。

人们常说,对移居到一个新国家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学习新的语言,到澳大利亚的许多亚洲移民也的确感到英语难学。但是,即便他们的英语说得已很流利,由于缺乏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了解,他们在社交中仍会出错。

语言和礼仪

如果移民意识不到这些文化差距,他们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两个人若在街头相遇,他们往往会问:“你上哪儿去呵?”或“你吃饭了吗?”。在英语背景的人看来,此类问候语或许是对他人的冒犯,令人不快,而且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在大多数英语国家中,尊重个人的隐私权是一个公认的文化概念。

在澳大利亚,跟人打招呼的典型方式包括“你好吗?”和“你怎么样?”虽然这种问话是对被问候人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但实际上并不需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们属于礼节性的问候语,是大多数语言的显著特点。一般

来讲,问话人会得到“很好”或“不错”之类的习惯性回话,尽管被问候人未必真的就感到很好。

许多中国移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的盎格鲁-澳大利亚朋友和同事为什么希望他们对这类问题作出肯定而不是符合事实的回答呢?有人曾问我,“如果他们不是真的想知道我感觉如何,那又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简直是虚伪!”也许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他们才会认识到他们是在根据中国文化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推测他人。

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有时或许会这样招呼别人:“哈罗!你今天看上去挺帅!”此时,问话人指的可能并不是被问者的衣着打扮,而是在乖巧地问一个问题,如:“你能否告诉我你要去看谁或要去哪儿?”对这个问题可这样回答:“呵,我今天得去见老板”或“我们今晚有一个聚会。”

在亚洲的许多文化中,当朋友或熟人在街头不期而遇时,他们会停下来相互问候,然后再或长或短地谈上几句,这取决于彼此关



左图,西澳大利亚州布鲁姆市街头一景。



右图,悉尼唐人街欢迎您。

系的密切程度。如果只说“哈罗”而不停步，则会被认为不礼貌。即使一方有急事，他或她也应停下来并彬彬有礼地回答问题。

在澳大利亚，人们比较随便，如果说，“对不起，伙计，我有急事”，或仅仅说声“哈罗”并继续赶路，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不理解澳大利亚人随随便便、不拘礼节的中国移民却认为这种做是唐突和不友好的。

吃！吃！吃！

在社交场合，中国移民常常感到困惑。下面就是一个典型镜头。一对中国移民邀请他们的澳大利亚朋友来家赴宴。澳大利亚客人到来后，男女主人指着沙发说，“请！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太太。坐！坐！坐！”澳大利亚客人有些惊奇，一言未发，坐了下来。喝了几杯饮料后，客人应邀到饭桌前就坐。女主人将食物摆上桌，而男主人则用筷子指着食物，盛情要求客人说：“请！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太太。吃！吃！吃！”

客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因此似乎感到局促不安。而主人却不断地说，“请！别光坐着！吃！吃！吃！”现在，澳大利亚客人似乎更不知所措了，心想，主人的言行举止真够奇怪的。与此同时，主人对客人的勉强也愈加不解。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好犯了一个“文化错误”。

在澳大利亚，为了表示热情好客，主人往往会说些“你想坐下吗？”或“请随便”之类的

话，而中国人则说“坐！坐！坐！”和“吃！吃！吃！”。不断说“坐”和“吃”是为了创造一种随便、热情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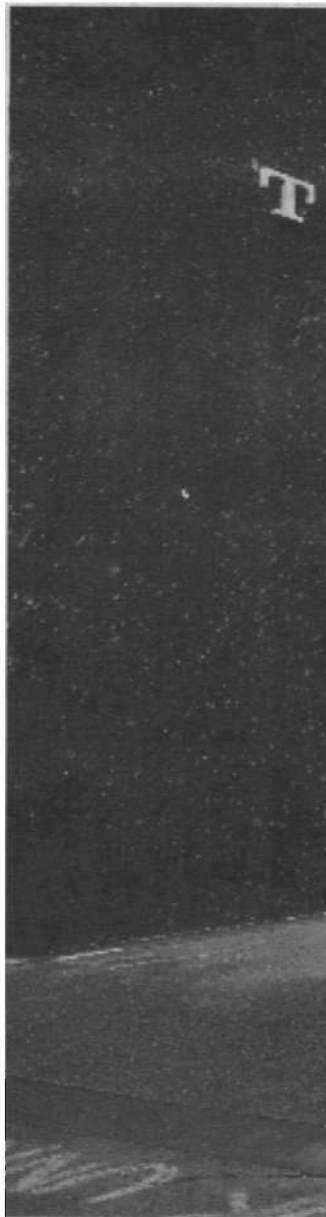
男女主人没有理解的是，“坐！坐！坐！”和“吃！吃！吃！”是祈使句，在英语中通常是用来向小孩子和爱犬发号施令的。由于他们将自己原先的文化用语搬到了澳大利亚的背景中来，他们不仅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效果，而且适得其反：他们把客人搞得心情紧张，局促不安。

永远别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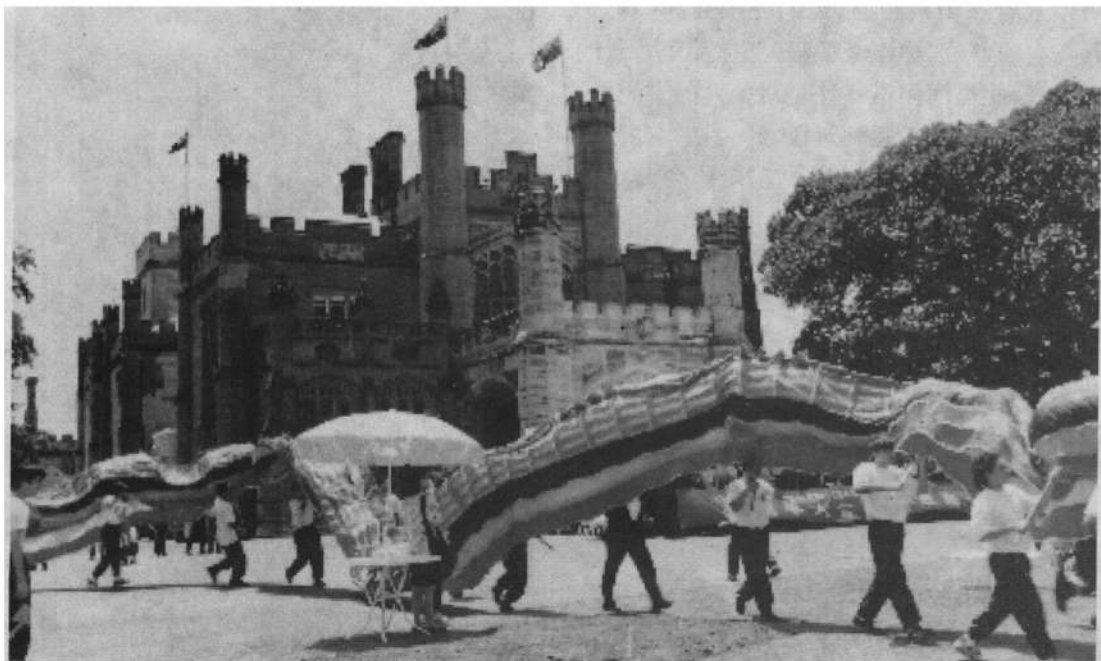
在亚洲的许多文化中，送礼是相互性的，是双方共同的义务。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如果收到了一件礼物，他或她就应回赠具有同等价值的某件东西。否则就失礼。

这种赠与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能促进友谊，创造和谐，加强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和同事间的关系。而在盎格鲁-澳大利亚文化中，送礼仅仅被认为是表示感谢或欣赏的一种方式。受礼人往往没有回赠礼物的义务。不过，他或她可以主动提出为送礼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如帮他们搬家或在他们外出度假时为他们照看宠物。由于这种差异，许多中国移民在他们的盎格鲁-澳大利亚同事或朋友接受了礼物而只说声谢谢时，感受到了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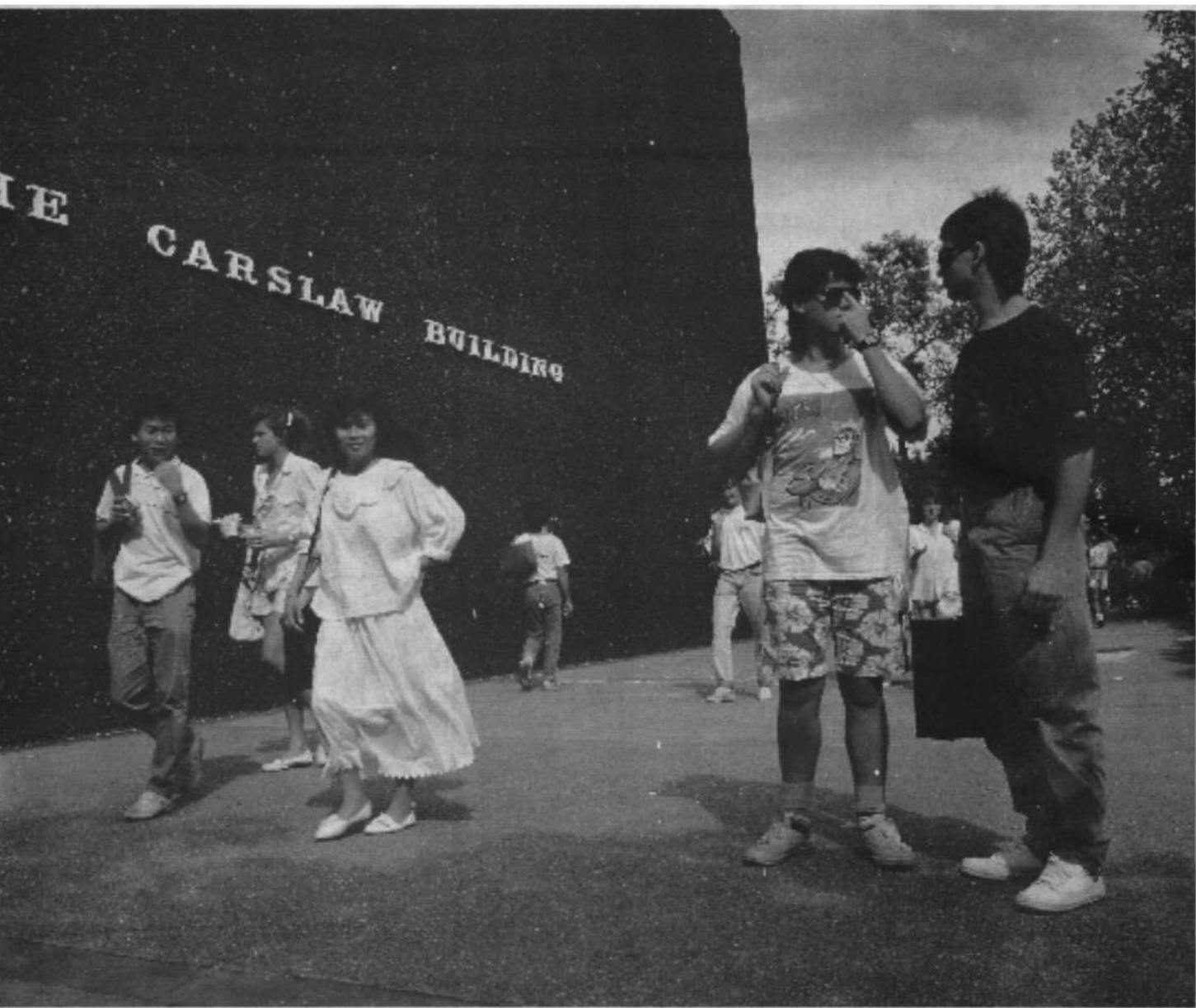
拒绝和接受邀请也会产生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接受宴请时往往遵循礼尚往来



上图，悉尼大学的学生。



左图，在悉尼，华裔和非华裔澳大利亚人在春节时表演中国龙舞。



的原则。换言之，他们不久就会回请。正常情况下，被邀请人会尽力应邀赴宴，但如果他们有事缠身或不喜欢主人，他们就会托辞拒绝邀请。借口往往都是些“无伤大雅的谎言”，但主人会接受它们，因为他或她明白，这是委婉、间接地拒绝邀请的一种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在文化上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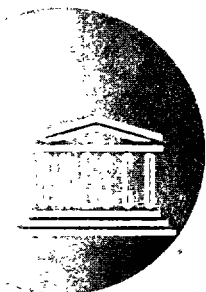
这或许是许多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经历的最大的“文化冲击”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给面子”，根据不同的场合，这可以翻译为维护某人的自尊或自我，尊重他人的尊严，不伤害某人的感情或不使他人感到难堪。拒绝邀请时，来自中国文化的人会尽力给对方“面子”，而不说“不”字，因

为“不”被认为会触犯他人。

因此，有些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人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拒绝他们的邀请（“对不起，伙计，我今晚不能来，我得修理我的剪草机。”）时，会感到深深地受到了伤害。这种回答往往会被中国移民理解为不客气或无礼透顶。这种误解其实并不是由用词造成的，而是由盎格鲁—澳大利亚人的随意态度造成的，因为这种态度与中国人的繁文缛节相去甚远。

语言是文化的反映。移民学着去理解一种新文化，同掌握一门新语言同等重要。当前，移民的语言教学往往过于狭隘。只有充分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动态关系，学习语言才能得法，使用起来也才能恰如其分。 ■

贾田(Jia Tian)(音译)，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在各种中英文报刊上发表过有关艺术、戏剧和电影的随笔、评论和特写多篇。目前，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正准备写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研究文章。



教科文组织在行动

简 讯

马新林 译

能源信息磁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的可再生能源信息资源和研究中心国际指南》第三版已由伦敦詹姆斯和詹姆斯科学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包括3,864个词条,是能源信息数据库的印刷形式,也可以通过软磁盘和光盘只读存储器阅读,该书提供了172个国家有关政府、组织和信息中心、职业和贸易协会、各种网络、培训和教育机构、数据库、期刊杂志和参考出版物的信息。欲知数据库的详情可致函, th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UNESCO, 1, rue Miollis, 75732 Paris Cedex 15, France. Tel: (33-1) 45 68 39 41; Fax: (33-1) 40 65 95 35.

海滩上的爱因斯坦

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爱因斯坦金质奖章已由总干事授予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当局,这枚奖章是在1979年为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而铸造的。该奖表彰了海洋公园当局对保护世界遗产和推行环境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拯救海洋奖

1994年3月1日是接受国际海洋环境奖申请的最后期限,该奖由世界水下作业联合会建立,旨在表彰在工作

中为保护海洋环境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组织或公司。世界水下作业联合会是1959年由法国水下探险者雅克-伊夫·库斯托组建的,试图在包括运动、科学、教育和考古在内的诸多领域发展水下活动。联合会成员目前有几百万人之多,来自80多个国家。该项奖金与 Prince Tomohito Mikasa 国际海洋奖一起,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于9月份举行的一次仪式上颁发。申请表可以向 Marine Awards, CMAS, Viale Tiziano, 74, -00196 Rome, Italy 索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敞开大门

只要提出要求,就能够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享受星期日免费导游,包括听讲座和看电影。欢迎个人和团体来访参观。欲知详情,请与来访处联系,地址是: Visitors' Service,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Tel: 45680371)。最近的地铁站是 Ségur 或 Cambronne。

教科文组织发行两种新纪念章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瓜拉尼人的耶稣教堂、巴勃罗·毕加索、尼赫鲁和世界人权宣言,这些事物之间有何共同之处?答案是它们都出现在教科文组织的纪念章上。自1974年以来,教科文组织已经发行了两种纪念章系列,一类介绍受到威胁的纪念碑和遗址,另一类专门介绍著名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日。最新发行的纪念章分别庆祝加泰隆画家霍安·米罗诞生100周年日和波托西城(玻利维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购买由巴黎铸币局铸造的镀金、银质和铜质纪念章,就能够为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和增进人民相互理解的工作作出贡献。纪念章可以在以下地点购买: UNESCO'S Philatelic and Numismatic Service, 7, Place de Fontenoy, 75700 Paris.

更正

我们对“蒲甘遗址录”这篇短文出现错误深表歉意,该文章登在《信使》杂志1993年10月—11月号第72页上。第二段中的“阿难陀寺”应为“南帕耶庙”。



费德里科·马约尔 的评论

梅祖培 译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撰写系列文章,
阐述他对当代
各种问题的想法,
本文为其中的一篇

格拉纳达精神

去

年12月,教科文组织在格拉纳达(西班牙)组织召开了一次由以色列、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参加和共同讨论巴以和解进程中理智方面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本组织对此引为骄傲。

在标志着本世纪最后几年混乱局面的所有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战略的变化中,令人鼓舞的是能够看到让许多人绝望的长期纠缠于如此绝对、如此根深蒂固的冲突中的双方竟然表现出了和解的愿望。如果有人能在80年代初预见到诸如冷战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或是巴以之间对话之类的发展,那只会遭到世人的嘲笑。

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坐到谈判桌旁的这一进程还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普遍意义。

改变命运

应该赞扬的是策划这次和解的设计师们,他们为1993年9月在华盛顿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姿态负起了责任。他们超越悲剧性的忿恨和不信任的背景,表现出了勇气、理智和远见。他们宁愿选择对未来的清白无辜作出的甜蜜的许诺(不论这种许诺是多么脆弱),而不愿忍受现时经历痛苦。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而且接受了为此而冒的风险,从而反映了人性中最高尚的一面,因为,正如艾梅·塞泽尔所说:“人类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蔑视命运的安排,使之改变成为历史。”

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对命运的挑战。和平的观念,尽管现时正奇迹般地笼罩在中东的上空,但却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必须参与该地区各族人民的努力,以确保这种和平得以加强。政治合作、经济开发以及削减军事开支肯定是为这所必需的。然而我相信,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和平的观念得以生根,并使个人和各族人民在道德和理智上的团结得以巩固。

有关和平的道德、文化和人性方面至为重要。无此则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的协议都是行不通的。有了这些,和平的文化便可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建立起牢固的基础;国家的能力便可逐步建立并得到加强;知识和技能

便可调动起来,而每个人的潜力也可为了共同的利益得到开发。

大约50年前,教科文组织确定了它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为反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偏见和陈规陋习而战斗,同时要保卫人权与和平,并希望防止曾经使犹太人民成为受害者的那种丑恶思想意识的回归。后来,根据同样的目的,教科文组织进行了种种活动,旨在帮助被剥夺主权、被迫流亡的几个中东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以阿之间的冲突及其在国际社会的诸多反响,导致了教科文组织内部令人痛心的分裂。

现在,这些裂痕对于教科文组织来说已成为过去。但在其组织法中所阐述的价值观念——主要是必须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保卫和平的观念并加强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道德和理智的团结——正闪烁着毫未减退的光芒,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历史的新篇章

过去的事是无法改变的。未来则不同于过去,它是尚未写出的,是可以改变的。只有属于我们共同遗产的那个部分依然完好无损。缓和紧张局势、理解、睦邻关系、团结、调和与和解,其关键是“未来的记忆”,而不是过去的记忆。不论冲突延续多久,敌对双方相互握手的时刻终究会到来。我们必须努力保证这样的时刻尽快到来,以避免无穷无尽的痛苦,使人民不致为了值得他们为之生存的事业而死去。

当然,对于那些在多年的对抗中,其人身或尊严受到伤害的人们的记忆必须给以尊重。从道德的角度,如同从实际理智的角度一样,都要求这样做,因为共同的未来不可能建立在轻视人们记忆的基础上。不过,既然忘记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决心揭开历史的新篇章,才能确保未来的记忆战胜过去的记忆。必须超越今天的现实去展望未来。“只有那些能够看到视力所不及的事物的人才能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政治目光短浅已经造成过多的伤害。我们现在必须去发现观察事物的新方法。

UNESCO 信使

本刊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每月用32种文字和布萊叶点字出版。

弗朗索瓦·邦文大街31号,75015巴黎,法国

主任:巴赫加特·埃尔纳迪

总编辑:阿代尔·里法特

总编辑部人员(巴黎)

编辑主任:吉列恩·惠特科姆

编辑:

英文版:罗伊·马尔金 卡罗琳·劳伦斯

法文版:阿兰·勒韦克 内达·埃尔·卡增

西班牙文版:米格尔·拉瓦卡阿拉谢利·奥尔蒂斯·德

马尔维纳

阿拉伯文版:阿卜德拉萨希德·埃尔萨德克·巴赫穆迪

俄文版:格奥尔基·泽列宁

学习与研究:费尔南多·艾因萨

美术设计:乔治·塞瓦特

图片:阿里央·贝利 卡罗尔·帕伯特

文献:维奥莱特·兰热尔斯坦(电话:45 68 46 85)

与非总部版联络:索朗热·贝兰

秘书处:阿尼埃·布拉谢 穆纳·夏塔

英、法、西班牙和朝鲜语布萊叶点字版选刊:

玛丽·多米尼克·布尔热埃

非总部版编辑人员:

俄文版:亚历山大·迈尔尼科夫(莫斯科)

德文版:维尔纳·默克利(伯尔尼)

阿拉伯文版:萨德·马哈茂德·谢里提(开罗)

意大利文版:马里奥·圭多蒂(罗马)

印地文版:根加·普拉沙德·维马尔(德里)

泰米尔文版: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马德拉斯)

波斯文版:萨杜格·瓦尼(德黑兰)

荷兰文版:克洛德·蒙特里厄克斯(安特卫普)

葡萄牙文版:贝内迪克托·西尔瓦(里约热内卢)

土耳其文版:塞尔皮尔·戈根(安卡拉)

乌尔都文版:哈基姆·穆哈默德·赛义德(卡拉奇)

加泰隆文版:霍安·卡雷拉斯·伊·马蒂(巴塞罗那)

马来西亚文版:西丁·艾哈马德·伊沙克(吉隆坡)

朝鲜文版:白承吉(汉城)

斯瓦希里文版:莱奥那德·J.舒马(达累斯萨拉姆)

斯洛文尼亚文版:阿历克桑德拉·科尔豪塞(卢布尔雅那)

保加利亚文版:德拉戈米尔·佩特罗夫(索非亚)

希腊文版:索菲·科斯托普洛斯(雅典)

僧伽罗文版:内维尔·皮亚迪加马(科伦坡)

芬兰文版:马尔贾塔·欧克桑宁(赫尔辛基)

巴斯克文版:胡斯托·埃加尼亚(多诺斯蒂亚)

泰文版:宝尼帕·林巴帕荣(曼谷)

越南文版:杜方(河内)

帕什托文版:兹马伊·莫哈吉格(喀布尔)

豪萨文版:哈比布·阿尔哈桑(索科托)

孟加拉文版:阿卜杜拉·A.M.沙拉夫丁(达卡)

乌克兰文版:维克托·斯捷尔马赫(基辅)

加利西亚文版:萨比埃尔·塞宁·费尔南德斯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未保留版权的个人署名文章和摄影作品可以转载,但须注明“原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以及刊期,并寄编者三份复印件以兹证明。翻印署名文章必须注明作者姓名。未保留版权的摄影作品如有要求,可予提供。除非附有邮资已付的国际回邮凭证,来稿一概不退。署名文章均系作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编辑部的意见。图片说明和标题系本刊编辑部人员所加。本刊所载地图的边界线并不意味着已得到教科文组织或联合国的认可或承认。

一切信件均寄巴黎总编辑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中文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1620 邮政编码,100810

发行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国外总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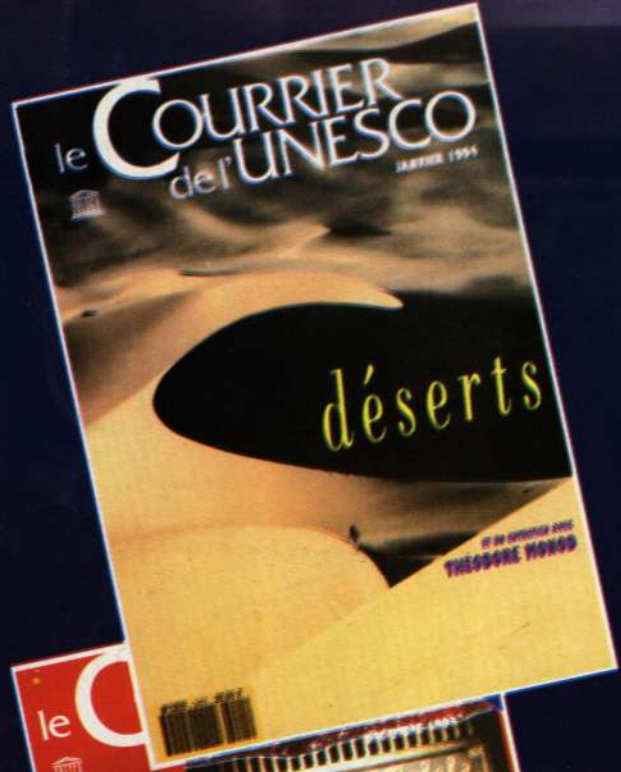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ISSN 0250-8869 No.5-1994

本刊代号:2-472

国外代号:M303

定价:3.00元



承订一份杂志 奉献给你的 朋友—— 有三条充足的 理由：

1.

这是唯一一份用32种文字出版并在120个国家拥有千百万读者群的国际性刊物

2.

每期刊物均探讨具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与知识

3.

它把读者与教科文组织“促进对正义、法治及……全人类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有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的宗旨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月出版,了解当今与未来问题必读

每月出版,通过不同国家和持不同观点……的世界一流专家们的眼睛透视一个普遍感兴趣的话题

每月出版,对来自艺术界、文学界、科学界、文化界……的某位人物的一篇专访

每月出版,有关环境、世界遗产、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活动等固定栏目

暴力……精神分析,隐秘的自我……爱的时代……生命之水……少数群体……何谓现代性……节奏,手势动作和圣事……裁军的时代……关于数字的故事……南北辩论,进步的含义……沙漠……多彩的语言世界

弗朗索瓦·密特朗……若热·亚马多……理查德·阿腾伯勒……让·克洛德·卡里埃……让·拉库蒂尔……费德里科·马约尔……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利奥波尔多·塞亚……保罗·弗莱雷……丹尼尔·布尔斯丁……弗朗索瓦·雅各布……马尼·迪邦戈……法罗克·胡斯尼……萨德鲁丁·阿迦汗……豪尔赫·拉维利……莱昂·施瓦茨伯格……塔哈尔·本·杰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雅克·伊夫·库斯托……梅莉娜·迈尔库里……卡洛斯·富恩特斯……约瑟夫·基泽博……文德娜·希瓦……威廉·斯蒂伦……奥斯卡·涅梅耶尔……米基斯·塞奥佐拉斯……阿塔瓦尔帕·尤潘基……埃尔韦·布尔热……阿卜杜勒·拉赫曼·埃尔巴沙……苏姗娜·里纳尔迪……休伯特·里夫斯……何塞·加拉雷斯……弗洛伊德致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吕克·费里……查尔斯·马拉穆德……纳贝托·埃科……奥利弗·斯通……安德烈·布林克……詹姆斯·D. 沃森……阿莫斯·奥茨……米歇尔·塞尔……奈奥多尔·莫诺……伊夫·科彭……

下期(1994年6月号)

人权

并以显著位置刊发人物专访

毛里求斯诗人爱德华·J. 莫尼克